長沙郊區文史

第三辑



长沙郊区文史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收集文史資料
為建設四化服务

丙寅冬常杏雲

目　录

参加长沙市郊土地改革的回顾

黄曾甫*

一九五0年春，我在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任秘书长，由中共长沙市委和长沙市人民政府选聘为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代表兼协商委员会常委，旋又由市委、市人民政府指派为工商界代表，同市劳动局张平局长、市总工会林楠秘书长一道去北京，出席中央政务院劳动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在会议期间，于三月十四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有幸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形势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最后谈到土地改革问题，勉励大家要过好“土改关”。从而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土地改革的重大深远意义。劳动局长会议之后，我率领长沙市工商联北上参观团一行十余人，到东北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学习，看到哈尔滨市郊老解放区经过土改以后，不仅消灭了封建剥削，而且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活跃了城乡经济，工商业出现普遍繁荣昌盛的景象。是年四月，我回到长沙以后，曾应广播电台之邀，发表过参观后的感想，又在《民主报》发表过《土地改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专文。积极宣传土地改革的重要，为迎接土改作好思想准备。

未久，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随即在

* 黄曾甫系省政协委员，省、市民建工商联顾问兼两会文史会主任。

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年七月，由市委、市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成立长沙市郊土地改革委员会，报经省人民政府转报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由许敬贤（市委组织部长）任主任委员，陆锦（市民政局长）、张以藩（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秘书长）为副主任委员，易锚、王化中、康德、黄曾甫、蓝肇祺、朱宜风、曹国智、马子谷、李凤荪、丑梅村、罗秋月、丁维克、谷曼、肖规、胡鹏、郑昌明、赵国忠、陈玉田、郑顺、张肃斋、丑俊云、王凯延、黄海林、邹吉祥等二十四人为委员。在南门外廓草田郊区工作委员会开始办公。并由胡鹏兼任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土改委员会之下，又设有三个专门委员会：一、调查研究委员会，由黄曾甫任主任委员，李凤荪、丑梅村任副主任委员；二、巡视检查委员会，由马子谷任主任委员，朱宜风、郑昌明任副主任委员；三、宣传教育委员会，由康德任主任委员，曹国智、谷曼任副主任委员。还在四个郊区分设各区土改委员会，由赵国忠任文艺区土改会主任；张肃斋、郑顺任岳麓区土改会正、副主任；陈风、朱中立任金盆区土改会正、副主任；陈玉田、苏明任会春区土改会正、副主任。各区土改会之下，又设若干土改工作队。访贫问苦，深入基层，从市级各机关团体抽调干部共二百三十五人，其中有湖南大学师生的土改工作队三十五人。阵容整齐，开展工作，十分顺利。

湖南省土改委员会颁布了《湖南省土改实施细则》，长沙市在此基础上，根据市郊具体情况，又制订了《长沙市郊土改实施办法》，以及《市郊土改中几个补充办法》。当时长沙市郊有三万五千二百六十三户，十七万五千二百四十二

人，土地面积共有十六万余亩。四个郊区辖有三十七保（村），其中有农业保、半农业保、街道市镇保三种类型，菜农、小手工业者以及地主兼工商业，杂处其间，情况复杂，工作相当繁重。有的地区，土地比较集中，封建剥削奇重，大地主有多至良田千亩者。双减时，据岳麓区一个保的统计，出租田地共二百二十八亩，押金计有制钱五十串文，银子二百四十两，光洋二千四百零七元，法币一百元，稻谷六百一十二石，可以概见一般农民生活贫困，生产落后。要开展郊区土改工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还必须通过土改之后，紧抓郊区建政工作，方能彻底摧毁代表地主政权的反动保甲及其爪牙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农民才能够彻底翻身。因此，市郊土改会在土改进行一段时期后，根据郊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又着手草拟了《郊区建政方案》。

在市郊土改实施办法中，根据政策规定，照顾工商业的利益。因此在实施办法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保护工商业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堆栈、晒场、厂址、铺面、房基、器具、交通工具等土地财产，均不得没收或征收。依靠工商业足以维持生活之工商业的土地、山林、水利、塘坝及工商业以外的房屋，应予征收。其非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之出产原料的土地，亦予征收。

我当时是以工商界的代表，参与市郊土改工作，因此凡涉及工商业兼地主的问题，均被邀参与协商处理。其中特别是河东文艺、金盆两区的砖窑厂及河西岳麓区的湘粉厂的问题，夹杂着土地所有权、租赁权、使用权等等问题，市郊土改委员会均经过反复调查，充分讨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若干规定。如关于砖窑问题，即有专门条文：“保护工商业与工商

业有关土地之处理，土改法已有规定，市郊所特殊者为砖窑问题。砖窑多而且问题复杂，地主多以其为工商业之一部分，想尽办法对抗土改，故作如下之规定：砖窑不没收。但：①除足供砖窑用地之外的多余部分，按农田论；②砖窑久已废置者，按农田论；③地主出租土地中，窑为工商业者所建并经营，土地没收，工商业者另立租约继续使用；④地主将窑与土地一并出租，土地没收另租，地上砖窑仍属原主。"河西岳麓区的湘粉厂有些厂房、晒场，以及枯饼行的堆栈，染布厂的作坊等，涉及有关地主土地的问题，亦参照砖窑问题的规定处理。

同时市郊毗近市区，过去有些官宦巨室及工商业资本家，建有别业园林，问题亦颇复杂，如副省长唐生智在文艺区蓉园乡，即有农民师兰桂退押问题；省长程潜的副官程德梅有与新合乡农民卢德胜、李泉生的纠葛；民主人士唐伯球在林子冲有房屋转让问题；辛亥首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代表人的龙璋家，散处在郊区各处的退押问题，都由市郊土改会另立专案，详细调查，妥善处理，该没收者没收，该退押者退押，该低头认罪者责成当事人或代表到乡认罪。特别涉及一些同乡会馆公产的土地问题，如金庭会馆在莲明、雨花、新合、桂花四乡，均有退押问题，当即会同长沙市地方财政整理委员会共同协商处理。我当时亦被聘为市地整会常委兼祠庙会产清理委员会主任，乃会同市地整会干部吴松辉、单传钦，召集金庭会馆代表吴省吾、沈商农、劳端生，叶泳闾等人（皆工商业人士）到场，负责清算，依法解决。还有绸布业的新绸庄经理王严森之父，因曾在桂花乡当过团总，也通过市工商联出面，将其保释，责成退押认罪解决。一切都做到

合情合理，秉公办理，既要保证市郊土改的顺利进行，又要按照政策，不损伤民族工商业的合法利益。当时市工商联在城乡联络处的领导之下，还在北门局关祠成立了支援土改工作组，由常委陈芸田任主任，黄曾甫兼秘书长，李寿增、舒瑞昌、王世传，邓济美、易炳章、沈商农、王照生等十人为调解评议员，配合长沙县土改委员会，市郊土改委员会，受理办理本市工商业兼地主的问题，做了不少的工作。

往事如烟，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回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经常得到陆锦、胡鹏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使我在市郊土改运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站稳革命立场，接受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我的神圣任务，没有在工作中发生过重大事故与差错。全市工商业兼地主的人士，也能顺利地过好了土改关。至今思之，犹感振奋。兹应郊区政协文史会之约，就回忆所及，走笔记此，以供修志的参考。但时过境迁，年老记忆衰退，可能还有不少遗漏和错误之处，尚望熟悉当时情况者补充订正之。

十年战斗迎解放（下）

钟昌前*

五、两度任教宜山

一九四三年二月，曾经在广东始兴师范任教的欧阳俊、刘彦邦、容民铎等同志（都是地下党员），通过广西省教育厅的关系，到宜山柳庆师范工作。我和曾梓材（家乡热水读书会最积极的会员、勤奋的读者）在这时候也由衡阳经桂林到了广西宜山。我们经柳庆师范辅导员周乐和（现在湖南省文联工作）同志的介绍，到了县城表证第二校担任教员。

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刘彦才，为人正直。几位青年教师的思想很进步。我们相互接触后都有好感，很快成了知心朋友。为了办好学校，我们提出加强民主管理、改进教学方法、开展社会活动、废除体罚……等建议，他们都积极支持，并在教师中展开一场大辩论。可正在这时一位姓周的老师，酒醉后毒打学生，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怒。我们抓住这一事件，发动学生和家长到县政府教育科去告状。结果，周老师受到了撤职的处分。但是，姓甘的校长有偏心，更仇恨进步教师。开始，他怂恿少数学生写恐吓信，造谣攻击教导主任。接着，他又拉拢地方恶势力，对抗进步的教师。最后，

* 钟昌前系长沙郊区离休干部，现为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民进省委常委和市委副主委。

他公开地向教导主任说，要以武力来对付。在这种情势下，我及时向党支书欧阳俊同志汇报请示。他认为，国难当头，不宜扩大事态，挑起地方派系纠纷，劝我们离开学校为好。于是，我和曾梓材离校去桂林。

到达桂林后，成达师范的教务主任陆静山（地下党员，当时是生活教育社桂林分社负责人，现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介绍我到教育书店担任助理编辑，曾梓材到上海木器社担任会计。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我结识了许多同志。如新安旅行团的童××，农村经济学家王易今，生活书店负责人赵子范，诗人施琴川，教师雷天羽、何岳飞等，他们中间多是地下党员，有的至今还与我保持了联系。

同年九月，刘彦才当选为县立表证一校校长，他电请我去担任教务主任。我在到职的同时，请来了朱袭卿（地下党员）担任辅导主任，陈宪中担任童子军主任。还聘请了朱袭夫，莫刚、韦述丰、朱玄等青年进步教师来校共同办学。大家通力合作，这期教学成绩博得了县府教育科与当地群众的好评。同年下期，校长刘彦才调龙胜干训班，学校行政工作、人事任免全由我掌握。这时，正当日寇进犯西南，许多进步人士从衡阳、桂林撤退到这里，我聘请了好几个同志来校任教，其中有演剧七队陈光、桂林中山小学教导主任许谟（均是地下党员）、桂林市教育局督学郭平（生活教育社桂林分社负责人之一）等。这样，在学校三十多个教师中，进步的占了优势，民主气氛空前高涨。

不久，表证一、二两校合并（共三十四个班，一千多名学生，六十多位教师），县府派刘尧（原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接任校长。他带来韦庄任训育主任，李某任总务主任。

接着，三青团宜山县团部派石开弦来校建立组织。这时，虽然学校换了几个负责人，三青团的组织也进来了，但是，绝大多数师生是进步的。加上新来的县长王浩明和教育科长张某都是国民党左派，思想开通，非常器重我，几次约我谈话，高度评价我的工作。他们还暗示我对校长要特别注意。因此，学校的大权仍掌握在我手里。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罢，都对我们无可奈何。校长刘尧也知道，只有依靠我，他才能在学校站住脚，工作上不得不同意我的一些意见。一次，柳庆师范李校长企图控制表证这所规模较大的学校，要派二十多个毕业生来任课。我只同意五个，校长和县府负责的都支持我的意见。李校长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校内，韦庄、石开弦要成立"童子军"，我提出要成立"工学团"。经过一番辩论，校长只好让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同意我意见的占绝大多数。另外，石开弦要在学校建立三青团区队组织，还要我支持他。怎么办？我只好请示党组织负责人欧阳俊和刘彦邦两人。他们认为，为了便于工作，要我也加入三青团。于是，我凭着平时与石开弦私人友好的关系，和他定了一个协议：三青团开展活动都由我支配。他表示完全同意。从此，我利用三青团这块招牌，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石开弦离开学校时还对我说："老朋友，团的工作你大胆管好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学校三青团的组织，就这样徒有虚名而已。

一九四四年下期，宜山县长和教育局长以及学校校长的人事都有变动，这对我的工作很不利。开学不久。西南联大张××教授和我的好友童××（都是地下党员）由昆明去台湾，经过宜山时与我会晤，他们谈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军事上的大溃退，极表愤慨。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请他们在全

校师生中，报告国民党在昆明制造"四·一二"惨案的经过。他们情绪激烈，讲演生动，师生们听罢，无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表示震怒。可是事后，校长黄紫光以"人地勿宜"的理由，撤除了我的职务，我被迫离开了宜山。接着，和我要好的几位同志也先后离校。

六、辗转黔桂线上

离开宜山以后，我们一路逃难，经河池、南舟到贵州独山，找到了陆静山、郭平两同志，又经他俩介绍，认识了县府秘书肖昌璜（地下党员，现任江西干州师院副院长）。我们原以为可通过他的关系找到工作的，但不幸得很，不久，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贵阳集中营去了。我们也先后到了贵阳。一九四五年下期，我在达德中学工作，其他几个同志也在贵阳中、小学任教。一天，陆愚夫（叛徒、曾认识）来校找我，要谈什么"营救"肖昌璜的事。我知道这话不是味道，有了警惕。待他走后，我便赶紧与息烽中学朱善猷（地下党员现在广州中医学院任院长）同志联系，隐蔽在他学校里担任初二班主任。为了安全起见，他改名李文华，我改名钟泽南。

在息烽中学这段时间，我们认识了息烽县邮局的张竹荪同志（张不久调龙里县）。他思想进步，经常秘密地把《新华日报》、毛主席著《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刊送给我们看。可是，这里环境非常复杂，附近便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中美合作所"，我们只能在深更半夜拿出来阅读，完了付之一炬。一个学期过去，朱善猷已被学校特工人员注意，当即转移到贵阳韶华空军子弟学校任教去了。我仍留息烽中学继续工作。一天，童××匆匆赶来，把前一天陆

愚夫有意召集二十多个地下党员（其中有朱善猷）在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宪警包围逮捕的事件告诉了我，之后，他在我手心上重重地写了一个“走”字又匆匆离去。我知道情况紧急，便化装出校，直奔龙里县邮局，找到张竹荪同志，请他设法掩护。他要我替一个病休的邮务员代班，我一连干了四个月，后与原宜山的同志接上了关系，便离开龙里，到广西罗城中学任教。

这里是一座山城，国民党的势力比较薄弱，我们开展工作很顺利。学校工作主要是陈光同志负责，我任教务主任。教师中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人数相当多。有一天，我们得知了肖昌璜、朱善猷等同志解除囚禁的真实消息，都满怀喜悦之情，召开晚会，频频举杯，欢庆战友平安，重见天日。那种热烈场面，至今难忘。

我在罗城中学工作了一年，于一九四七年下期经友人介绍到柳州湘桂黔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负责编写教材。这里，年青人多，湘籍同志（如杨继兴等）也多，我们志同道合，相处友好。我和刘绍祖、李瑞庆合伙订阅了长沙《实践晚报》、重庆《世界知识》、《中原》杂志阅读，不料竟惹出了麻烦。中统特务头子鹿茂堂和他安插在职工教育委员会的几个特务分子，扬言要查清我的政治身份，是否属于异党分子。他们先后叫杨继兴、刘绍祖到“调查统计室”（特务机关）去谈话，询问我的情况。杨、刘两人异口同声说，钟某只是思想激进一点，绝非异党分子，所订书刊报纸，无非是想了解一点家乡情况和国际形势而已，并无其他企图。虽经这样解释，没对我采取行动，但仍要我停止订阅这类书刊，并有人随时跟踪着我。我住的宿舍搬来一个特工人员叫谈传

奇的，他经常拆看我来往信件，查问我阅读的书籍。我早已意识到这家伙居心叵测，生活中特别警惕。每日在家潜心研究古典文学，间或写点古体诗词。过了三个月，谈传奇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可疑之处，才取消了对我的严密监视。

我编写的教材都要进行审核。自从我在交通部办的学报和铁路工会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就可由自己定稿，不再送审了。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在教材里选编一些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的著作。有一次，我将金仲华的地理图解和翦伯赞、范文澜的现代史编进教材，被总局职校校长陈海西发现，他特地找我私谈：“钟先生，你好大的胆子。在这特务众多的地方，选这种激进的教材合适吗?”我看他的态度是善意的，就把教材内容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我在黔桂线上已辗转多年了，虽投身于风风火火的斗争生活，但仍有时触发思乡之情。我曾作小诗抒怀：“自别家园后，他乡几度秋。湘江天际远，异地客增愁！岳麓而今健，洞庭依旧流。我为云外雁，何日得回头？”朱善猷同志知道我的心思，但他考虑当时有个新的任务——掩护部分同志和亲属（如熊子烈同志、黄道奇同志的爱人熊雪辉、刘道衡同志的女儿熊惠珊等），还要我在柳州再待一段时间。我服从工作需要，为使他们得到安全而尽力，仍留柳州。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来到长沙，经朱善猷同志介绍，担任长沙医院职工夜校教师。我与朱善猷、宋楚湘、梁器之、易长初等同志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共同策划迎解工作。八月，湖南和平解放了。当时，我已在党的领导和教养下，经过整十年的战斗、锻炼，赢得了自身的解放。这是我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　　（续完）

我在陆军医院分娩前后

谷 芳* 口述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被国民党反动派拘禁在长沙市汽车东站后面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一间监狱里。已经七个月了，无以数计的审讯、酷刑，并没有从我这个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子口中，得到了一星半点的什么。当时，我身怀六甲，已临近产期，终日饮食难进，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同牢房的有几个武汉大学的学生，她们眼见我活活遭受折磨，义愤填膺，不时向窗外逡巡的警士责骂：“人家快落月了，关着不放，还要毒打，你们有人性没有？”“让孩子生在牢房里，你们绝无天良，也不得好死。”……我呢，早已横了心，要如何就如何，要想探听共产党的情况，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出乎意外，一个守传达的老头把我领出牢门，引向城外南郊……。一路上，我不敢随便与老头拉话，因见他态度和善，便问了姓氏，才知道他姓刘。

刘老头送我进了国民党的陆军医院(今省立一师附近)，经医生检查胎位不正，马上给我绑了胎。医生要我就近走动走动，并摇电话告诉警备司令部，说我两三天后即将分娩。我趁这个机会央求刘老头，让我外出买些棉花草纸，他用同情的眼光打量我一下，手轻轻一扬，低声说：“快去快回便

* 谷芳系省机械工业厅离休干部。

是。”

我约摸陆军医院离南湖港茶亭子（今南湖路）不远，七个月前，我和爱人李林（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湘北工委副书记，奉调赴香港中共华南局学习）带着孩子山亮（李林前妻黄凤烈士所遗），从岳阳来长沙时到过那里，那是赵篾匠（赵连生同志，地下党太乙寺支部书记）的家里，我们的孩子山亮就寄居赵家，不知情况怎样。我急忙赶到那里，知道附近特务甚多，就装着问路，站在篾货铺门口和赵嫂子悄悄说了几句话。我这才知道，唐先生（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的化名）听到我被捕后，已托人将山亮转移到东山那边去了。我气喘吁吁又往城内南阳街松雪纸庄熊子烈家里（地下党联络站）跑去，一个女佣人出来打招呼，说熊家已经全部迁走。我心想，两三天后就要生孩子，不能连累别人，只好买了些棉花、草纸回到了医院。刘老头早已等得不安了，他见我腹部臃肿，步履艰难，催促着而又无可奈何地对我说：“司令部要你回监狱，走吧！”

过了两天，刘老头又送我去陆军医院，一路上相互沉默不语。到了城郊，行人稀少，他突然问我：“你知道肖伯鳌吗？”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话怔住，随即马上又镇定下来，带着反问的口气答话：“不知道。他怎么啦？”当时，我内心是多么急切地想知道肖伯鳌的情况，可刘老头久久默不作声，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肖伯鳌和李林都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时留下的地下党员，他在一家米店里做工作为掩护。七个月前李林去香港时，因任务紧急，一时不能把我送回老家耒阳，正在犯难时，肖伯鳌同志慨然同意让我暂时留居他家中（南门口吴家

坪，今五星坪五号）。李林离开长沙才两天，晚饭后，我正在门口乘凉，忽地一部吉普车冲过来在门口停下。六、七名便衣气势汹汹跳下车，说是查户口的，对我逼问：“你是什么人？男人在哪里？……”肖伯鳌的姐姐肖复华连忙上前，指着我解释说：“她是我表妹……”便衣们不由分说，抓住我，推上车，直开到警备司令部，把我送进监狱里。那天晚上，我上厕所，经过另一牢房，发现肖伯鳌也抓来了。他伏在窗边，象是喃喃自语，却又是给我示意，说：“莫明其妙，把我抓来了，又把我一个同学的家属也抓来了。”我正想上前和他交谈，一名警士在一旁吼道：“不许讲话！”过了两天，送牢饭的人递给我两个合起来的面包，中间夹了一张纸条，我躲到厕所细看，一行铅笔字写着：“只说你丈夫与我同学，其他事要守口如瓶。”以后，每当我有机会走过他的窗户，他时常用寥寥数语安慰我，鼓励我，他是个多好的同志呵……想到这里，我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刘老头补问道：“肖伯鳌，他怎么啦？”

“他，被活埋了。……只穿条短裤衩，口里……塞了一条毛巾。”我听不下去了，一行热泪夺眶而下，只差点哭出声来。刘老头看在眼里，他好心地安慰我，警惕我，继续说：“听说，肖伯鳌的问题与你无关了。……你生下孩子要是逃走不了，就会把你送到法院，坐穿牢底。至于小孩，不会让你长久抱着，要送育婴堂去……”刘老头送我进了医院便转去了。

古历十二月初九早晨八点钟，与我一道经受七个月铁窗生活磨难和考验的小生命，在国民党部队医院的妇产室里呱呱坠地了。我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听到周围人们的议论。

有人说：“肚子里有个细伢子，还要犯法，真是鬼迷心窍了。”也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本本分分的样子，能犯什么王法？！”……待我神智完全清醒了，一位护士前来帮我梳头，洗面，问我识不识字，要不要看报纸。她悄声对我说：“不要害怕，他们又没有抓到你男人，你怕什么罗！”说完，向我苦苦地一笑。当时，我觉得，虽然是住在国民党医院，有人误解我，屈辱我，但，也有人在同情我，抚慰我。我一定可以绝处逢生的。

我生下孩子才两天，又被警备司令部传审。那天，正值小雨加雪，寒风刺骨，浑身冻得哆嗦。路滑泥深，实在难走。两个人押着我。那个姓罗的见我走不动，对我拳打脚踢。另一个姓唐的看不过意，说：“她刚生下小孩，不要再打她了。”他还自己掏钱，雇一辆人力车，让我坐车上。

在审讯室里，那审讯的官腔十足，望之俨然。他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对我说：“肖伯鳌的问题，现在与你无关了。但是，你男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交代清楚。”他停了一会又继续说：“你想出去，就找个熟人担保一下，你能找到吗？”

“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的孩子呢？”他换了话题。

“在医院。”我答得很快，知道是问刚生的孩子。

于是，他非常果断地向在旁的命令：“押回医院。”

我回到医院，时刻想着逃走。可是，手中没钱作旅费。若不离开长沙，便始终逃不了魔网。怎么办呢？我正在发愁，一位驼背的勤杂工（姓陈，不知名）一躬一躬地到我跟前，偷偷地塞给我两块光洋，他说这是一位“太太”给的，

嘱咐我不要声张出去。次日早晨，我想寻找逃走出处，起床后在医院门口徘徊。守门老头与我一见如故，象知道我的一切似的，非常同情我。我爽快地把心事告诉了他。他说：“你白天跑，那会找我的麻烦。晚上跑吧，跑了就不干我的事。”这天白天，我作好了一切准备。到了半夜，我轻轻把孩子暖在怀里，悄悄地离开了医院，离开了这个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爬上了往南的货车，到了衡阳下车。在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门口，看见了熊子烈的夫人。我迫不及待地问她，在监狱里有人说李林和唐先生都被捕了，可是事实。她说：“冒，冒，唐先生昨天还来过这里，李林同志已经到部队去了。”这一下，我可放心了。当即回到耒阳老家。

不久，地下党联络员谷安昌来家接我，我抱着孩子到了湘南支队，见到李林同志。这天晚上，李林带着游击队员正在擦枪，准备出发……。

（李山日记录整理）

·〇·〇·〇·

（下接第18面）
的八十七师和五十四师，虽有进展，但阻力很大。这时，沈阳派出的解围部队已临近四平，解放军于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夜，主动撤离四平。半月的四平之战，就此结束。

“四平之战”亲历记

王卓超*

一九四七年六月间，陈明仁指挥的反人民内战中的“四平之战”，曾经轰动中外。而今有关记载和传闻也较多，但以事隔多年，难免有失实之处。笔者始终参加了该次战役，兹将概况忆而记之。

是年五月中旬，解放军围攻驻守怀德的国民党新一军的一部，陈明仁奉命率该军的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解怀德围，遭到解放军的伏击，部队溃散，陈只身狼狈逃回四平。

当时笔者任该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团长，驻守辽源县（现改为双辽县）以北的卧虎屯。五月下旬某日中午，我突然接到师部电话命令，要我放弃卧虎屯，三小时后乘火车开赴四平，归军指挥。旋又接到陈明仁由四平打给我的电话，要我丢弃屯粮和笨重行李，火速赶到四平。我团于次日晨如期到达。

这时的四平，既无守军，又无工事。逃难的人群拥挤在车站上，人心惶惶，形势十分危急。当我见到陈明仁时，他满面愁容，心情忧郁。匆忙谈了情况后，要我团全面布防，以待后续部队。

数日后，八十七师放弃辽源、通辽的防区，也调来四平

* 王卓超曾任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副师长，现为民革郊区支部成员。

（该师驻通辽的二六〇团在赴四平增援的途中，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另由沈阳增援的五十四师两个团，也先后开到四平。同时，由怀德逃回的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的残部也集结于四平。陈的防守布署是：以临时编补的八十八师和辽北省一个保安团守道西（因铁路从四平中心南北而过，将四平分成道东、道西两部），以八十七师和五十四师（各欠一个团）守道东。九十一师的残部由副军长向凤武指挥，移守昌图县，意图保持与沈阳的交通线。当时，四平守军虽有三个师的番号，但都残缺。有的部队毫无战斗力，如果解放军下怀德后直取四平，可垂手而得。后因解放军南下攻昌图，费时约二十天，给四平守军以喘息整备之机。

在解放军攻昌图期间，四平守军征集大批民伕，平地筑起丈高的土城，挖了丈宽的外壕，又布满了各种障碍物，士气有所恢复，部队得到整备。

六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午后五时左右，四平南郊升起三颗信号弹。接着，解放军以从未有过的密集炮火，猛轰四平西南和东北的守军阵地。黄昏即发起猛攻，入夜即突破道西南面保安团的阵地。同时，在道西又打开几个缺口，攻进城区。当时，陈明仁的军指挥所驻道西，已受到威胁，他指调我团仅有的一个预备营去守卫军部。第三日，解放军已逼近军部，陈明仁秘密地把军指挥所移驻我团团部（道东东北角某教会中学内），直到四平解围才离开。

解放军攻进道西后，因国民党的空军整日轮番出动轰炸，牺牲较重。但仍于五、六日后占领整个道西区。

解放军旋又进攻道东区，恰恰碰到以逸待劳战斗力较强

（下转第16面）

文艺区和平解放前后

李玉希*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在前长沙市政府区保干事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文艺区任干事。现就我所知道的有关该区和平解放前后的情况，略述如下：

（一）

解放前，文艺区人口约五万多。地域呈不规则的长叶形，长约十公里，宽约五公里。东从滩头坪、沿马王堆、五里牌、杨家山、红粉墙、胡家垅与长沙县毗邻；南自南元宫（今人民路），魏公塘（今窑岭）、左家塘、赤岗冲与长沙县境相接；西起环城马路城墙外从经武路、协操坪（现东风广场）、小吴门、浏城桥、南元宫入口与城北、城东、城南三区接壤；北由经武路、沿杜家山外围与会春区邻近，再过浏阳河至滩头坪止。此地平原广阔，土质肥沃，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剥削，堤坝失修，天灾人祸，民生凋敝。发展经济，受到局限。区公所设在韭菜园汤公庙。当时区级编制已由十六人缩减为八人（计区长、区队附、民政干事、经济干事、户籍干事、事务员各一人，区丁二人）。下有八个保办公处共三十二人。每保设保长、保队附、保干事、保丁各一人。

区设有自卫大队部，计有官佐四人（大队长、大队附、

* 李玉希系长沙市民政局离休干部。

教官、办事员各一人），通讯员一人，由长沙市自卫总队部领导。每保设有自卫中队部，各中队有中队长、中队附、办事员、通讯员各一人。中队以下有区队长、分队长、班长（兼职或聘任）。

区内有八个保国民学校共教职员四十人。每校有校长一人，教员四人。其经费来源除市府按月发给生活补贴外，学校可收取学杂费，不够时还可自筹基金。

区有区民代表会共十七人。设主席一人，区民代表十六人（人员由各保负责选出）。

区内情况较为复杂：有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军统特务吴建树，他破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搜捕地下党员，是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罪魁祸首；有三青团骨干分子胡泽亮，他以纸铺老板的身份，曾经在这里发展过反动组织；还有地方特务长沙市参议会副议长罗德钰，区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史俊宣，潭洲通讯社周济时，都是一批互相勾结的地头蛇。其他如区长陈焕霞，前任区长谢友诚，区民代表会主席余茂林，区民代表阳春庭、黄俊明，保长柳汉祥、谭润武，殷实商号瑞丰米厂史瑞奇等，都是把持区级政权的土豪劣绅。特别是前任八保保长周兆雄，曾经陷害过前湘潭游击司令张鹏飞。一九四九年他来区里曾对陈焕霞说，他以反共有功，得过长沙警备司令部一笔奖金。当时，我和民政干事王沛然在一旁听了，觉得此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故意伸出舌头，对他说："你得了这笔人命钱，将来会要以命来偿还的。"他听后毫不在乎，反而说："我为党国效劳，怕什么？"事后，我们纷纷议论他，太心狠手辣，决无好下场（解放后已处决）。

一九四八年上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在长沙市立第一商业学校学习。有位同学名叫邵志诗，当时在省参议会工作。他年轻有为，思想进步，与我感情较好，无所不谈。他说："今天这个社会的政治极端腐败，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只有投靠共产党才有出路。"他秘密地拿出《革命的人生观》、《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给我学习，这才使我逐渐地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粗浅的认识。

次年武汉解放后，白崇禧军队退踞长沙，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刻，住在黄土塘的刘锦安自告奋勇来区，充任自卫大队义务教官。他一到职就组织自卫队员学习和训练，清点枪枝弹药，加强军械管理，把区里武装力量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还介绍我参加了中共北一区委领导下的工贫解放社。我们更进一步地摸清基层情况，为解放后党派军代表接收区政权作好准备。

不久，住在新军路的老友陈衡甫（地下党员），介绍我认识了姚家巷讨米的彭光烈（地下党北一区委书记，原名陈光烈），两人一见如故，谈得投机。临别时，他嘱我安心本职工作，把区里枪枝弹药、文卷档案保管好，多替人民办好事。还要我及时向他反映各方面的情况。

当时，政治更加黑暗，货币贬值，物价昂贵，公教人员生活无着。由于省会各厅局及市小教员工先后爆发了两次索薪索粮的斗争，扩大了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我们也趁势找城东区公所干事冯兴发（东区工贫解放社成员）文艺区邹梅溪，城西区刘立新，城南区曹孟萍、会春区李世雄等在东牌楼城东区公所碰头密商。当即决定：各区干事回区

后，立即分途下保进行串联，向在职人员传达，要求政府把薪俸改发银元和实物，拒收纸币，并发动组织区保人员及保校教员到省、市政府去请愿。这一正义行动，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先后到达省、市政府请愿的区保人员及保校教员达四百余人。经过两次罢工罢教的斗争，迫使市府对各区保人员按照每人每月俸金标准一律改发银圆六元、米贴八斗的实物；各区保校按月还发给生活补贴。这场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根据长沙市临时治安指挥部（地下党市工委领导的）统一布置，我区自卫队员们，配带符号，携带武器（枪枝或梭标），在境内日夜巡逻，名义上说是维持社会秩序，实际是开展护厂护校运动，防止敌特破坏。当时，长沙汽车修理厂（厂址在窑岭附近）的负责人都已逃跑，遗留枪枝二十余支无人管理。当地中队长王云阶（多次掩护地下党老党员张友初、张洞初开展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即负责将该厂警卫班的生活安排好，并协助组织人力，日夜执勤守护机器设备，以防损坏。区所辖各保国民学校的财物，则由自卫大队责成各中队负责，协助各保校组织人力，共同执勤保卫。如六保校教员徐亚辉(解放区参军南下，在广西剿匪时被害)、沈淑勤（市二轻职校退休教师）等人，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他们负责看管的房屋、校具均完好无损。总之，我区完成护厂护校任务甚好。

八月初，我区接到市迎解联关于解放大军即将入城，作好迎接工作的通知后，立即召集各保研究，作了具体安排，各保设置茶水供应站，连夜派员下保组织人力，书写标语、横幅，赶制三角旗，排练秧歌队伍等准备工作。解放军部队

入城路线重点在我区辖境，我们发动群众万余人，于八月五日晚八时以前到达五里牌、南粉墙、分路口、中心点、小吴门等地，按指定地点，整齐地排列在沿线两旁人行道上等候。到九点，威武雄壮的解放军一三八师到达五里牌，进入市区。两旁人群有的递茶送水，赠送慰劳品；有的挥动旗帜，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大家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这一伟大的迎解场面，实属空前未有的盛况。

（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委派军代表赵国忠率领接管人员陈光烈、王子英、李化民、姜固中、彭泽民等同志，来区与原有区公所同志见面，亲切会谈区级新政权的建立。我们原文艺区公务人员，从此摆脱了旧时代的枷锁，投入了人民的怀抱。我们早已张贴标语，表示热烈欢迎。二十三日，赵国忠正式通知办理接管手续，由区长陈焕霞负责移交“长沙市文艺区公所”印章一颗、全部文书档案、区保在职人员名册、枪枝弹药清册、办公家具清册等，我在场协助双方移交点收。二十四日，长沙市文艺区人民区公所成立（系市人民政府派驻机关），军代表和接管人员分别对原有职工个别谈话，并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起义人员政策精神，分别作了以下几种处理：（一）继续留用；（二）少数受训；（三）自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和遣散费（每人大米两百市斤）。采取了以礼待人而又慎重妥善和平接管的方法，使留者安心，去者愉快。接管后的人民区公所人事安排名单如下：区长赵国忠，副区长陈光烈，秘书王子英（地下党

员），民政助理员姜固中（南下干部），财粮助理员李化民（南下干部），调解助理员有我和邹梅溪（留用），文书收发周育智（留用），办事员邹良骥（留用），炊事员彭泽民（地下党员），通讯员苏南生（留用，后在郊区人民政府退休），周寿生。新任保长张琦、陈德生、姜书林、王云阶（留用）等。九月中旬，市财政局抽调钟声骥、熊先绪（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参干）两同志来我区协助办理征粮工作，由区决定调我和王子英、姜固中一道下到滩头坪、赤岗冲、左家塘等地，会同老农民协会会员丑俊云等，召开支前征粮群众大会，开展征粮活动。那时，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掌握了粮食大权，窥测我们的行动。他们扬言要暗杀征粮人员，用麻袋装着抛入浏阳河内。生活在基层的地下党员（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如丑七公等，随时向我们通报敌情，引起我们高度警惕。我们有时住宿一日数迁，有时住在户外木仓里，由地下党员通宵放哨，巡逻防护，以保安全。有次，我们在滩头坪把征粮分配名单张贴后，次日即被撕去。经调查证实，系原保长周国武幕后指挥的勾当。事后，由公安部门以破坏征粮的罪行，把他镇压在杜家坡。反动的气焰打下去了，征粮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按时完成了供给前方军粮的任务。

十一月七日，我和邹梅溪、王云阶、姜书林调长沙市人政民府公务人员训练班，参加第二期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工作，从此离开了文艺区人民区公所。

张承俊枪杀逃难女的经过

杨树生* 口述

一九四四年深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门口陈家冲山嘴上砍柴。无意间，瞥见垅那边过来两人，越走越近，径直向孙家塘雷子桂保长家走去。走在前面的，是个被绳捆索绑的小姑娘；紧随后面的，是个高大汉子，望岳乡自卫大队分队长陈汉湘。他俩进到雷家屋里，片刻，便有人传说，自卫队抓了一个“日本侦探”。

我和愤怒而好奇的群众，纷纷奔去看个究竟。

乡自卫队是先一天流动到这里的。大队长张承俊（又名潞生，解放后已镇压）很快来到雷家，他要亲自审问一下早几天陈汉湘向他报告所抓获的“日本侦探”。

雷家灶屋里挤满了人，我钻进人缝中，看见那绳捆索绑的姑娘立在中央。她着麻黑色上衣，青裤上缀着补丁，身材瘦长，年约十三、四岁，稚气而显露惊惶神色。雷保长弟媳搜查姑娘上下身，连脚上破布鞋帮也掰开细看，没发现一点可疑之物。

审讯开始了。张队长态度严肃，问姑娘姓甚名谁。她操外地口音（可能是湘乡籍），怯生生地答话。接着，张队长问她一连串问题，诸如：家住何地？家有几口？从哪来？往哪去？帮鬼子兵干过什么？……姑娘畏怯，直发愣，结结巴

* 杨树生系东方红农场退休干部，住该场延农管区划林塘。

巴，似答非答。大家听不清，更听不懂，只有邻保保长张自文伏在一旁勉强地记录。

张队长带气地要找陈汉湘来。可一时竟不知陈的去向。他恼了，转向姑娘质问：

"你是在桥头铺被抓的，那里有多少日本鬼子？"

"那里，有……鬼子……"

"多少？"

"有……"声音颤抖着。不知谁插问了，"你看见桥头铺的桥没有？"姑娘无力地摇着脑袋。张队长也接过话题追问："桥在铺上的哪一头，是东？还是西？"几经盘问，她已神智不清了，时而说东，时而道西，颠三倒四的。人们疑惑不解，议论纷纷，有人私语："年轻妹子，能做'日本侦探'么？"、"这妹子是谁家的？怪可怜……"

这时辰，我父亲杨兆林、哥哥杨树棠还有雷春生（住孙家塘）、龚月生（住孙家塘对面港子塅，当时任副保长）四人一齐出来求情："潞四爹，这妹子不象个'日本侦探'呵，放了她吧！"张队长固执己见，"不行。放了她，我们整个自卫队的生命安全，谁个负责？"大家怔怔地站着，一时不敢回话。哥哥壮着胆子仍央求地说："我家有间空屋，把这妹子关着，不让她出去，大家送饭养活她，能行么？""你敢具结担保一切？！"张队长锋利的目光直盯着哥哥，哥哥不再吭声了。大家也不敢吭声了……

中午，都去吃饭了，姑娘被绑在雷家大门口，坐在门坎上，端一碗芋头饭，和着泪水咽完了。我们端详她：双目失神，小脸污垢，蓬乱的头发里有虱子在蠕动，这分明是个"叫化子"，却谁也不敢担保她。……

午后五时许，姑娘被几个持枪荷弹的自卫队员押解出来，过了几条田埂，在陈家冲子山嘴边停下。我们见此情景，知道不妙，便一窝蜂地围上。"闪开点，快闪开……"自卫队员大声嚷着。有的人上前讲情，持枪的说："队长的命令，只能执行。"大家无可奈何，只求他们远走一步。自卫队员又押着姑娘，翻了一个山坳，走到益牛塘塘基上，准备执行命令，可那里群众也一样，要求她们更远走一些，越远越好。自卫队员不敢自作主张，又把姑娘押回雷保长家，请张队长面示。父亲趁机邀了一干人，又一次苦苦地去替姑娘说情，这一回似乎张队长动了心，"好吧，暂缓执行，带到坪山再说。"张队长说罢，随即带领这支约三十人的小队，转移驻地。

队伍穿垅而上，姑娘走在长蛇阵的前面，群众目送，有的尾随。我沿着田埂在队伍右侧跟追。他们才走里多地，刚到道山嘴，忽地停步，自卫队员们注视着约两百多米处的正前方（老屋塘，吴家祠堂），那边，一个穿黄呢子上衣的高个儿出现了。他们疑是敌人，立即警戒。张队长指挥队伍依山埋伏，架设机枪，准备战斗，并对姑娘作紧急处置。当时，我站在六大垅子踏桥上，与他们只有三、四丘小田之隔。我看到几个自卫队员把姑娘推到山嘴的塅旁，由黄新其（队员）举枪"呯！呯！"两响，"妈呀，妈……"一阵惨叫，彭德祥（队员）又紧紧补了一枪，可怜的姑娘从此结束了她的生命。随即有人提供情况，说那穿黄呢子上衣的是住附近梅山岭的居民郑有旺，从老屋塘出来回家去，自卫队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一阵虚惊，一幕惨剧。姑娘被枪杀后，张队长只顾领兵直奔坪山，拂袖而去。

次日上午，我爱人路过道山嘴，姑娘还躺倒在山塝上，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不久，群众凑钱雇请庙山吴七爹，寻了一床烂草席，裹着姑娘的尸体，背到盐龙寺前面的廖家塘坡，草草埋葬了她。

事后，群众才知道陈汉湘的确抓了一个女"日本侦探"，她住大南冲，小名叫李珍伢子。此人作风放荡，恬不知耻。传说陈汉湘抓她时大腿上贴有膏药，膏药里藏有日本证件。陈抓李后，发生不正当关系，将李放走，但此事先已报张承俊队长，陈无法交差，只好在路上抓了这个外地姑娘顶替。还有人说，已死姑娘是个童养媳，同家娘、未婚夫逃难到此，因被那母子俩狠心抛弃而离散，接着遭此厄运。

（火原纪录整理）

湘江两岸擒敌寇

刘樟树　李子文*　口述

我俩生在湾湾市（今长沙市西区湾湾镇），长在湘江边。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小挨饿讨吃。长大了，有时靠一双粗手驾点零碎划子(即租船摆渡)，有时靠一副硬肩膀抬扛打轿，赚得几个血汗钱，勉勉强强填饱肚子。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鬼子占据了湾湾市。我们逃难到了河西山冲里，东躲西藏，投靠亲友。正是荒年荒月，打搅别人家，日子久了也不行呵。怎么办？

何芳甫招兵买马　两伙计应邀"吃粮"

当兵，又叫"吃粮"，当兵的就有粮吃。眼下正规军都撤退了，要当兵只有加入游击队。我们正想着，谭春廷（又名谭威，小名谭一癞子）找来了。他比我们大几岁，也是一伴子长大。今日他来不为别事，正是相邀"吃粮"去。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参加了"何芳甫俘虏队"。我们不知道何芳甫是何许人，他说，何芳甫是广西柳州人，刚从中央军校毕业，在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二百二十九团迫炮连担任少尉排长。长沙沦陷后，何芳甫就向上司立下了军令状，要组织一个俘虏队，活捉日本鬼子，立功报国……。我们听了他介

* 刘樟树系湖南人造板厂退休工人，李子文（原名菊生）系长沙市运输公司退休工人。

绍，觉得此人蛮有气魄，是个好汉。又想到，日本鬼子到处奸淫、烧杀。掳抢，真是无恶不作，弄得中国人民没法生活，实在太可恨了！此刻，谭春廷既是奉令来的，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吃粮”去。于是，我俩伙计齐声接应：“好！跟你走。”

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十来个人。有湘剧团演烂巴腿的郭正，有住河边落棚桥的穷哥儿周玉华（又名周弼），有搞过侦缉的胡迪，还有和我们一起驾零碎划子的蒋定国、杨玉林、张桂泉（小名张四癞子）和唐松柏。我们穿的百姓衣，吃的百家饭（由当地保甲长派饭吃），没有发给武器，却要活捉鬼子。

我们选定活动的地带为湘江两岸。沿江，敌军来来往往的比较多，我们又对每个湾湾角角很熟悉。捉俘虏方法，先侦察后行动，队员有分有合，到时候各显神通，各行其是。

何队长再三交代：“你们三三两两在外活动，一定要遵守军纪，爱护百姓。如有违犯，要从严处分。”他还叮嘱大家，遇到国军盘问，要回答得出：军长叫彭位仁，师长叫唐生海，团长叫许炳焕。不可乱说。

他向我们许愿：“捉得活鬼子，有赏！”

俘敌兵倍受嘉勉　更番号又增实力

万事起头难。我们要摸清沿河一带敌情，要学会说几句日本人常用的话，要想方设法去跟鬼子打交道……那天走运，就能探得点情报；那天运气不好，被鬼子掳住当了苦力，受气挨打，也真叫活见“鬼”了。再说，个别没有骨气的穷哥儿，混进了日本的和平军和宪兵队，有的认得我们。

万一冲着脸，都会拼个你死我活。还有，要注意莫碰上通敌的坏家伙，他们点了眼药（暗示敌人，使捕获），就莫想逃脱身了。最要当心的是：驻在渌湾市街上同昌枯饼行的岳麓宪兵队杨队长，原名佐藤，是个日本人，会说中国话。他经常化装外出侦察，来无影，去无踪。若被此人抓住，要遭活埋的。我们只能时出时没，伺机行动。一两个月过去了，一个“舌头”也没有抓着。上司在责问，何队长作了难，他被传到团部黄材（属宁乡县），谣传会要革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关口，我们送个俘虏去了。

抓获第一个俘虏，没费多大的气力。

我们坐在银盆岭后街茶铺喝茶，面对江上观察，忽然间，几架美式轰炸机进入湘江上空，机枪“嘟嘟嘟”的扫过江面，逼得一条帆布篷小木船靠近岸边。一个高个子日兵跳下了船，慌忙钻进裕湘纱厂围墙坪里，坐在一棵树下躲避。谭春廷很快溜到河边，窥见那小木船舱里空无一人，他笑咪咪地转回来说：“一块肥肉，送上钉板了。”

我们掩蔽在围墙附近，胡迪、谭春廷主动上前与日兵聊天：

“西可乌欺　巴苦唐嗯　阿托司　西怒”

（意思是：飞机丢炸弹，会死人。）

日兵不高兴，不理睬。

谭春廷凑近日兵坐下，说：“朵乌坐　他巴可窝”（意思是：请抽烟）递上一支香烟，随即擦燃了火柴。日兵接过香烟叼在嘴上，凑拢来点火。就在这一瞬间，胡迪举起一把“鬼脑壳”小刀，逼向日兵，叫声“不许动！”我们就蜂拥而上。日兵右手早被谭春廷挽过，动弹不了。他左手夺刀，

死死抓住刀柄。胡迪纵身把刀一提，锋口从日兵手掌上划出，顿时鲜血淋漓，直痛得他一身发软躺下，任凭我们捆手捆脚。我们找来一根大木杠，将他手脚都捆在木杠上，象抬猪一样抬出了银盆岭小街。离开了警戒区，进到山冲里，我们便把日兵松了绑。他乖乖地跟着我们走，走了一天多，到了黄材团部。

团部马上通令嘉奖，把我们作上客招待。原先谣传何芳甫会革职的，这一来，他提升为中尉排长了。他心中欢喜，特制一种两面有锋口的小尖刀，奖给每人一把。他称赞地说："这个，比胡迪的'鬼脑壳'刀子还好。"

我们留在团部半个月，学射击、学化装、学侦察……团部还挑选一个主力班（配有机枪、步枪、手榴弹）与我们合并，这支扩大了的队伍，改名为"何芳甫突击队"。

贺队附节外生枝　破计谋差点折本

我们继续沿河流动。

冬日的一个下午，驻扎在三汊矶的一列日军约近二十人，经过银盆岭，向滦湾市方向行进。根据平常侦察的情况来判断，这列日军到达滦湾市不久，仍然会转回三汊矶驻地。我们马上集中全队兵力，研究战术。队附贺杰（又名建五）清点人数，发现谭春廷在家（住滦湾市）没来，即派队员黄德胜（住银盆岭）去通知火速归队。当下有几个队员反映，说谭春廷在外活动，胡作非为，不守纪律，影响很坏。贺队附听了非常气愤。他说："待归队后，一定严办。"何芳甫只顾考虑对策，他认为这次日军人数多，不宜活捉，只有设法歼灭。我们按他的计划行事，把六颗手榴弹捆在一

起，埋在裕湘纱厂门卫前的路面下（这是敌军回转时必经之地），牵好导火线。我们分布在附近河埂、围墙内等有掩体的几处。一切布署好了，只等敌军来送死。

这时，谭春廷迅步赶到，贺队附劈头盖脑训斥他，他哪里肯服。两人吵闹不休。贺队附大怒，命令丁特务长把谭春廷捆住，马上押走处决。何队长看见了，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但又不便直说。我们在一旁更是吓得不敢开口。丁特务长只好应命，带上两个队员，把谭春廷推到后山上，只听得"呯！呯"两声枪响，就结果了。

这时，转回的那列敌军已逼近银盆岭街口，突然闻到枪声，马上警戒起来。他们散开队伍成弧形推进，把整个山头、小街统统包围了。我们只得改变计划，寻找缺口突围。不多久，裕湘纱厂门卫那个制高点已被敌人占据，我们受困在沿河一段。天渐渐暗下来了，敌人迫不及待地想吃掉我们，派一个日本军曹带着一个士兵下来搜寻。何队长和我们掩蔽在河边一间破屋里，听得鬼子的皮靴声由远及近，快到屋门口，何队长对准两枪，两敌人应声倒地，我们忙把两具尸体拖进屋里，剥下军服。这时天已昏黑，枪声四起，何队长指挥我们在黑暗中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经过裕湘纱厂门卫侧面的时候，欧班长和张桂泉被敌人密集的机枪射中，不幸阵亡。我们背着这两同志的尸首，终于突了围。离开阵地时，驻滦湾市和三汊矶的敌军已经赶到。他们打着火把，四处号叫，银盆岭已乱成一团了。我们连夜赶路，经排山、永安，宿在盐龙寺（今郊区职业中学校址）。请当地保甲负责，用木棺安埋了我们的两个伙伴。

特务长手下留情　谭春廷将功补过

我们以为谭春廷早见阎王爷了，没想到丁特务长执行命令时，觉得他平日为人义道，勇猛肯干，不忍下手，就对天放两空枪让他跑了。他虽然免了一死，却吓得魂飞魄散。那顶常年不摘的席草帽被树枝挂落。他一气跑到家门口，遇见熟人了，才把身上五花大绑的绳子解掉。事后，他主动归队承认错误，要求自己立功补过。何队长也总结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把全队分成三个小组，胡迪、曹德修（家住市内）、王柏生（湖北人）三人分别担任组长，我俩与谭春廷都编在胡迪这个组。

胡迪领我们又来到银盆岭，看见敌军一官一兵正跳下船，沿江向滦湾市走去。我们分散在前后盯着。走到龙王港子，因便桥被水冲垮后一直没有搭好，不能过去，只好都转回来。快到银盆岭渡口，两敌军准备回江东去，眼看嘴边的肉吃不成了。谭春廷急忙上前一把栏住。

"太青，可衣，哇他洗瓦　可付列嘎阿奴。"（意思是：长官，来，我有小船。）

两敌军警惕地望着谭春廷，又望着跟在后面的我们，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跳上他们原来的小船，摇浆离开河岸，向东驶去。我们分别跃上两只小船追赶，只撑了一篙、摇了几浆就赶到他们前面。谭春廷故意用篙子把敌军的船点得左右摇晃，两敌军抽出长刀、短刀要与我们拼搏。他们前伏后仰，站不稳脚，一动就有翻船的危险，任凭我们摆布。我们两船逼上去，举起篙浆，威胁他们投降。站在岸上的群众，有的拿砖头，有的拿木棒，也帮我们喊打助阵。两敌军无可

奈何地丢下刀，举手投降了。

我们剥去敌军身上的军服，叫换上便装，又脱掉他们的马靴和袜子，让赤足行走（敌军怕石头顶脚，不敢逃跑）。我们飞快地把两敌军领出了银盆岭，走上山沟小路，便是我们的天地。我们仍旧叫敌军穿上马靴，押着走在前面，直奔队部卯田（今属望城县）……

新开铺诱敌入套　霞凝站硬功逼降

次年春插季节，何队长领我们七个队员渡江到大围子（今南郊新开铺一带）去活动。那天，他头带一顶皮帽，身穿蓝布长衫，下着新布鞋，看上去活象个买卖人似的。快到新开铺镇上，他观察了一下地理形势，选定了一间无人居住的民房，叫李子文等五个队员在此埋伏。他腰藏驳壳枪，手挽一只小竹篮，篮里放些香烟、酒等吃食，并令王金龙、刘樟树随后，向镇上走去。一路上遇见来往的日军，他频频挥手，毫不在意。到了镇口，他说："你们在此稍候，我去鬼子兵队部。要见机行事。"说罢，他径直向日军队部走去。不一会，只见两个日军跟他一道走来了。何队长边走边说着半中半日的客套话，大意是：家里有一大宗上等的百货，请求皇军多多照顾。家就在前面不远，特备酒菜，请赏光……。两日军喜笑颜开，不时回答："顶好顶好的。"何队长按照预定的地点在前引路，刘樟树、王金龙暗中随后。说话间两日军已踏进那民房，见房内空空如也，情知上当，转身就往外跑。这时，随后的两个队员上前拦挡，埋伏在内的五个队员一跃而出，何队长掏出驳壳枪，冲着两日军说："不准哇里哇拉的。不听我的，就死啦死啦的。"于是，两日军只好

遵命，脱下军装、鞋袜，换上便衣，走在我们中间，过湘江，经坪塘，直上卯田……

不久，王柏生组也大显身手。

这个组，有个方大汉（记不清名字了），力气过人。有个周兵，机智而勇猛。他俩与王柏生三人生死与共，早已结拜为兄弟。他们都是身高膀阔，虎里虎气的莽汉，经常活动在白沙洲、霞凝一带。

那天，王柏生领着组员渡江去霞凝那边，他约定我们在回龙洲河畔等着。不到半天功夫，他们果真押两个俘虏上船了，直荡到我们等候的地方。上岸以后，王柏生瞪着大眼，气呼呼地向俘虏斥责："老实点。要不，送你们去见天皇"。然后，他告诉我们，在霞凝车站附近捉住这两个鬼子，夺掉刺刀还不投降，最后，硬是摔交拼搏一阵子……。根据这个情况，我们防止在警戒区出事，特地找来两副竹竿轿子，"优待"两个鬼子坐上去。我们抬过白沙洲，进到山区，就命令俘虏下轿同我们一道步行。经过巴巴岭、坪山，到了卯田。

押俘虏途中被劫　抵安化分道扬镳

我们先后寄押在卯田司令部的俘虏共有六个，据说何队长拿俘虏做"人情"，在押的剩有四个了。何队长决定把这四个送到安化蓝田师部去。那日，我们全队人马出动，押着俘虏，行至道林（属宁乡县），在一家人家吃饭时，被×乡长报了"正义军"。这班"正义祖宗"（老百姓憎称）飞快赶到，他们人多，来势汹汹，先把何队长、曹德修两人缚住，又把我们的人都关进谷仓里，直等到把何队长、曹德修及四个俘虏带走了，才叫屋主将我们放出。

我们憋了满肚子气，有人提议各散五方算了。大多数人却认为，何队长被抓走了，应该报告部队去营救。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一直奔到安化兰田。

在兰田街上，我们恰巧碰到"正义军"押着何队长等人穿街而过，赶忙报告了部队，当即派了一个特务连前往交涉，才把他们都接过来。不几天，部队移防开拔，愿跟着走的可以参加部队，不愿跟着走的可以回家。我们大多数人从此离开部队，回到长沙了。

（火原记录整理）

望城坡杀敌记

李子文　口述

一九四五年盛夏，我和谭春廷、曹德修、周兵、苏大汉、方大汉（原都是何芳甫突击队的成员）会聚在长沙西郊望城坡杨家茶铺隔壁的一家饭铺里，把各自侦探得来的敌情，进行商议。

当时，驻在望城坡吕家大屋的一小队日军已经调防了，这儿没有“生意”可做，我们打算午饭后再去别处活动。

谈话间，一列日军约摸十来人，“嘁哧喀嚓”正从铺上经过，我们料定是桥头铺日军大队派来望城坡驻防的。大家心中暗喜，“生意”来了。

方大汉尾随这一列日军，看见他们果真驻进了吕家大屋，随即便找到了维持会会长艾福泰（绰号艾六白菜，屠夫），说要在这坡上寻点“生意”做。艾福泰一听话里有话，连忙摇手劝说：“搞不得的，出了事，不得了……”方大汉向他提保证：“我们决不难为你。”艾福泰还是那句话：“出了事不得了，莫搞为好。”

大家听了方大汉的回报，决定等待时机行动。饭后，派周兵前去侦察，我们研究战术。五点钟了，周兵兴冲冲跑来，说有两个鬼子上理发店了。大家议了一下，立即出发。

周兵把我们带到坡口一家理发店门口。我们瞥见两个光着上身，腰佩刺刀的鬼子正在理发。苏大汉急忙拉我们到斜对门庆丰恒南货店里，由他指指点点，吩咐我们怎样行动。他还说活捉日兵后，从东头黄泥岭上带走。正在店里喝酒的一位顾客，见我们叽叽咕咕似已猜出几分，忙向我们双摆手掌。其他顾客也很快领悟了，都劝我们罢手。可这办不到，到了嘴边的肉怎不想吃？

先是苏大汉和谭春廷迈进理发店，他们满脸堆笑，主动向日兵拉话：“西山，米西米西的。”日兵吭了一声，面对镜子，一心只顾理发。修面了，两个日兵仰着身子躺在椅子上，正是下手的好时机。周兵和方大汉趁机溜进理发店，蹲下身子，看着苏大汉的脸色行事。苏大汉，腰阔膀大，力气过人。站在他旁边的谭春廷虽只有中等个儿，却异常勇猛而有几分蛮劲。他俩交换了一下眼色，上前把两个年青的理发员往旁边一推，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长毛巾，分别朝日兵喉管上一搭，他俩一转身，便和日兵背靠背了。就在这一瞬间，周兵和方大汉已将日兵腰间的刺刀抽出在手。我和曹德修也箭步上前，准备抓手捉脚活捉这两个日本鬼子。可这两个鬼子都身高体壮，猛力反抗，终于挣脱开去，向西头（吕家大屋方向）奔跑。我们奋力拼搏、拧住、紧跟，没让日兵出店门两步，周兵和方大汉已挥刀，猛向日兵背部一戳。一个被刺穿心脏，象黄牛那样“嗷嗷”叫了几声，没走几步便倒在血泊里；另一个虽已刺伤，却能忍痛逃跑。我们随后急追，追了约二十多米，方大汉才揪住，他朝日兵心窝上一刀捅去，日兵血涌如泉，倒在关圣殿的门口，见了阎王爷。

望城坡下坡这一段铺面上，顿时秩序混乱，人们情态紧张。都知道关圣殿往西几十米就是维持会会址，维持会再往西头十几米转弯处，便到了吕家大屋——日军的驻地。情况

紧急，我们这几个伙计也顾不上商量后事了，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各的。我决定从东头街口跑出，上黄泥岭隐蔽……，经过理发店的门口，我向店里呼喊："你们要躲开，要赶紧跑呀！"

（文煌、与师纪录整理）

回忆日寇对我家的残害

彭玉林* 口述

我世居望城坡。坡西头叫大坡，又叫上坡；坡东头叫小坡，又叫下坡。抗日战争时期，我开设的"观音阁理发店"，就在东头进坡口左边的第三家。

一九四五年酷暑的一天下午，我在附近一家人家闲谈，约模五点多时分，邻居袁桃华跑来喊我，她神色紧张，满头冒汗。看见我，她已慌乱得说不清话了，好不容易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快……回去，你家……出事啦！"

我大步流星奔到街上，只见小贩收摊，店铺闭门，人人紧张，惶恐，一片混乱景象。来到家门口，一股腥味扑鼻。但见西头不远处，有一具血肉模糊的日兵尸体躺着，鲜血遍地。再顺血滴往前看，另一具日兵尸体倒在关圣殿门口。我心慌意乱走进家门，爱人、侄儿（彭明德）、小柳（雇工）都面色苍白，不知所措。他们向我嘀嘀哆哆，吓得言不成句。我来不及细问情由，赶忙吩咐小柳立即回家（他家在长沙市内）躲避。我们紧扣店门，收拾衣物，准备转移。

正当铺上紧张、混乱的这功夫，住在泗洲庙（离出事点约百米）的甲长刘福生闻讯赶到了现场。他见状后直奔滐湾市，向日本宪兵队报告，这桩"凶案"是中国兵干的，与"良民"无关，意图保全望城坡居民的生命和财产。近黄昏

* 彭玉林住望城坡，原系理发工人。

时，宪兵队派来一班人到达望城坡铺上，拖走了两具尸体，没有对百姓惊扰。有人以为，这场风波可能就这样平息了。

我不放心。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店里，我又是户主，还是暂时避开一点为好。于是，当晚我寄宿在隔壁杨木匠家，一夜不敢合眼。

第二天，才麻麻亮，铺上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马蹄声。我一听便知不好，翻身起床从门缝中一看，铺上布满了日本鬼子，维持会长艾福泰也在当中。那宪兵队杨队长（日人）手执马鞭，在我店门口指指划划。还听得有人告诉他，“昨天，我们的人，在这里，死啦死啦的……”杨队长猛一扬鞭，一声“咳！”众日兵上前乱脚踢门，踢得乒乓直响。我担心爱人和侄儿，正愣神儿看着。忽然，杨木匠焦急地拉我一把，指向后门，我才蹑手蹑脚溜出去，远远地躲在草丛里，注视着铺上的动静。

一会儿，我看见侄儿也从屋后溜出来了，向另一头跑去……

一会儿，敌人的喧嚷、叫嚣和女人的哭声混成一起……

一会儿，听见艾福泰高喊：“彭明德，你回来，不要紧，大家保住你……”又看见他向侄儿跑去的方向招着手、追赶，继续喊道：“彭明德，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皇军就放火了……”他身后有几个鬼子紧跟着。

侄儿信以为真，停步了。几个鬼子抢上去，捉住侄儿，押回铺上，随即又押到黄泥岭上张宅（张家早已转移后方，只有雇请的一位老人张八娭毑看守）。从此，侄儿落于魔网。

敌人抓住侄儿，还嫌不够。又把艾福泰按倒在污水沟里

（现望岳镀锌厂后水沟），拳打脚踢一阵，忿忿撤走。

我回到铺上，责怪艾福泰不该把侄儿叫回转。妻子却说：“莫怨他。明德叫不回，鬼子们决不会罢休。他们口口声声要把望城坡‘火罗火罗’的。再说，我这条性命也难保……”群众安慰我，给我出主意。有什么办法呢？黄泥岭上张家四面是围墙，谁敢去探个讯、求个情？我只好把家属送到山冲里，自己到城里去想办法。人上托人，保上托保，也没有人能够把侄儿搭救出来。第二天，明德的未婚妻受了这重大的刺激就得了急症，不幸夭亡。再两天后，驻在黄泥岭上张家的日军撤走了。张八娭毑（张德钧的母亲，已故）噙着老泪，踉踉跄跄来到铺上，叫群众赶快去给张明德收尸。她说：“这伢子抓去以后，受尽了苦刑：烟熏、火烙、灌盐水、吊打……折磨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被扔到了井里……”当时，我不在家，多亏左邻右舍帮助，把侄儿尸体从井里（这口井现在帆布厂汽车停车站附近，春波理发店左侧）打涝上来，就近掩埋了。

却说出事的当天傍晚，宪兵队把两具日兵死尸陈放在溁湾市金华坪喻家大屋。他们抓住过路的老百姓，强迫要给死尸打扇。死尸火化后，把骨灰盒送回望城坡的那天，鬼子们提起东洋刀，用刀背砍向迎面而来的群众。

（文煌、与师纪录整理）

长沙早期玻璃制造业史料一页

肖树农　肖彦农*　口述

麓山玻璃厂的创建过程

先父肖泽（1879—1953），号丽生，湖南湘潭人。自幼在长沙生活，进过几年私塾。平时酷爱学习，尤喜读科技一类书籍。他曾在长沙市邮政局供职十多年，利用业余时间，博览群书，钻研科技，并常作些化学小实验，掌握玻璃制造中化工原理。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他立志开拓玻璃生产事业。

民国初期，他从邮政局退休后，与戚谊合伙，在南门外碧湘街开设一家制造明瓦（又称片瓦、亮瓦，盖屋上可透光）的小作坊。这作坊可说是长沙最早玻璃制造业的雏形，它的技术设备简单，产品低劣。作坊内有土炉两座，用碎玻璃为原料，仅只生产明瓦。明瓦表面多气泡，不光滑，既不美观，又不耐用。为了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他先后去上海、广州等地，调查了解我国玻璃制造业生产情况。从上海带回一种新式炉设计图纸，用耐火砖和砂石仿造建成。又从广东聘请一批技术工人，充实自己技术力量。

新式炉外面是个大围子，围内设有五、六个坩埚，每个坩埚容量约五、六百磅，大大超过了原来土炉的容量。而且，煤烟经地道从烟筒排出，炉内通风，排气效果好。投入生产后，克服了玻璃表面气泡多，不好看，不耐用等缺陷，在产品质量上有了突进。又在此基础上，新增加其他产品，如煤油灯器、灯座、灯罩、美术花瓶、大小糖缸、茶杯等。不仅产品数量增多，且品种类型大有更新。与此同时，父亲又在长沙、湘潭两地招收一批徒工入厂，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技术。他们在广东师傅具体指导下，进步很快，出师后都能熟练地生产操作。待大部分广东师傅撤回原籍，这批工人大多已成为厂里生产骨干。他们是我省第一批从事玻璃生产行业的技术工人。

厂里具有一定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后，父亲把从邮政局领来的两千多光洋的退休金，与一彭姓大地主（当时湘潭商会会长）合伙，并邀集部分小股东，共筹资金银元约计四、五万，于1912——1913年间，创办了长沙第一家玻璃制品厂——麓山玻璃厂（以下简称"麓山"）。厂址设南门外张公桥（今书院路路段内），占地约十亩。厂设有董事会，只派一名会计管理财务。父亲任职厂长兼工程师，主管生产管理和技术，人称玻璃大王。

"麓山"与"长江"两厂竞争

"麓山"拥有新式设备，又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当时，在长江中上游一带，这样的玻璃制造工厂也是少有的。本来，"麓山"可以发展成为一家大规模的工厂，然而，办厂刚刚两年，生产正走上正轨，却遇到外来劲敌。一外号"山西胡子"日本浪人，从日本带来几十名技术熟练工人和一批生产设备，在南门外书院坪开办一家"长江玻璃厂"（简称"长江"）。"山西胡子"自恃有技术、有设备，精通经济，且

* 肖树农系湖南省工业厅退休干部，肖彦农系长沙市岳麓公园退休干部。

认为中国原料富足，市场广阔，劳动力低廉；更视其中国政府并不重视民族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许多工业项目都是空白，“长江”一定能挤垮“麓山”，占领湖南阵地，进而垄断中国南方大片玻璃制品市场。而“麓山”已有两年办厂经验，规模已具，生产稳定，资本比较雄厚，又是本地经商，有一定优越条件，故敢于与“长江”抗衡。在整个竞争过程中，“麓山”以主人翁的姿态，维护民族尊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扩大销售。加上国人坚决抵制日货，大长民族工业气势，使“麓山”在竞争中得到政治上的优势。因而，“长江”开业以来，生产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没到两年功夫便被挤垮了。“山西胡子”不得不带领原班人马偃旗息鼓，怀着无法形容的沮丧和遗憾离开中国，回归日本。

“麓山”在与“长江”竞争中虽然取胜，但同样经济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生产亦开始趋向下坡，赢利微薄。维持近三、四年，后因股东之间意见分歧，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只得宣告停业。

宝华玻璃厂的兴衰

“麓山”停业，父亲事业不曾因此停止。他继续筹集资金，与朋友李国钦（长沙县南托乡湖塘村人）合影，做起了开采锑矿的生意，牟取可观利润，后来，父亲资助李国钦去美国开办炼钨厂，自已则用此资金专心致力于玻璃工业。一九二一年，他邀集股东，在南门外灵官渡（解放后曾叫新胜街）建立宝华玻璃厂（以下简称“宝华”）。全厂资金约计银元八千，本家与戚友投资各占二分之一。父亲仍任厂长兼工程师，四叔肖锡芝、满叔肖衡甫辅助。其他职工系“麓山”

原班人马，因驾轻就熟，开业以后产品销行全省，业务兴盛。曾送产品去参加巴拉马赛会，获得奖励。此后外国人因见玻璃配方不及中国的，便委托上海一个大资本家来湖南，要用七万元光洋买去“宝华”制造玻璃的配方原本；父亲不仅严词拒绝了这种交易，而且更加发奋研究，配出了金红玻璃、艳蓝玻璃、高等中性玻璃等几种当时较为特殊的品种。

“宝华”日益发展，然地处江边码头，难以扩张。若逢汛期，江水漫进厂区，影响生产。两年后厂又在猴子石购地二十多亩新建厂址，建成后将灵官渡设备船载猴子石，继续生产，仍称“宝华”。另在小西门正街开设发行所，经办批发零售业务。

“宝华”迁猴子石后，非常注重产品质量与生产技术革新。生产中换以石英石或石英砂作原料，用煤气机带动碌磨碾压石英石，然后再装入坩埚熔化。所生产的玻璃制品，光洁度、透明度良好，且结实耐用。又增加品种，生产化学实验用的试管、容器、量杯仪器，彩色的生活日用品等，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经过几年经营，厂已略有盈余。又增加设备，并在醴陵招聘部分技工，增辟瓷器生产。

“宝华”职工生活比较优裕，全部在厂内供应膳宿。工资标准也较高，每月基本工资为银元三、四十不等。若生产顺利，还可得到基本工资两倍多的赏金，一般技术工人均有积蓄。职工生产积极性很高。

“宝华”扩大生产后，产品价廉物美，声誉日高，一时成了湖南省玻璃行业的佼佼者，曾一度抵制了日货输入，为群众称道，社会瞩目。惜好景不常，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委派财政厅长谭九思来厂进行名义入股，实则是官方不投资，只分红利；并且委派一些闲空人员进厂，一不恤厂务，

二不懂技术，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反而给厂以累赘，因而每况愈下。不几年，“宝华”便被鲸吞摧垮，由湖南省银行接收官办。父亲反被诬陷，若不是友人报信及时逃走，几乎身陷囹圄。一年后，谭九思等人从中做好与父亲言和，相约不再提及往事，才告终了。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华战争愈烈，谣传敌军逼近长沙，人心动荡不安，“宝华”只好往湘西辰溪拆迁。这时，谭九思又请父亲出面继续办厂，招拢原班人马，将厂内机件（除炉子）全部运走。未料行经常德时，适逢敌机轰炸，大部分财物被毁。抵辰溪后，所遗残破机件已无法开工，加之官方又拿不出资金，人员被迫停工。

长沙文夕大火后，“宝华”原址(猴子石）虽幸免于难，但只剩下光秃秃炉子，无力重新开业。曾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宝华玻璃厂，在日帝侵华战争的硝烟中渐次消失。

“麓山”“宝华” 播种各地

“宝华”毁于兵燹后，父亲应湖南省银行前任行长彭石年的邀请，携眷离开湖南，去资源丰富的贵阳兴办贵州玻璃厂(该厂于解放后由我妹夫谭剑鸿接管)，它饱经沧桑，至今仍在。另有叔父肖衡甫、堂弟肖荫云(现长沙市政协副主席、长沙热水瓶厂总工程师），肖杰吾，分别创办了桂林玻璃厂、九龙玻璃厂和香港玻璃厂（该厂解放后迁至长沙，为长沙热水瓶厂）。我与堂弟肖赖吾经管的衡阳宝华玻璃分厂，在战乱与经济危机中拚命挣扎，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麓山”、“宝华”培养出的大批技工，他们相继在各地办起众多的小型玻璃厂，虽然生产规模远远不及“宝华”，

它们却大大地推动了我省民族工业中玻璃制造业的发展。长沙市南门外大椿桥的湘金玻璃厂，以及在常德，衡阳、邵阳等地玻璃厂皆是。在外省的有汉口三友玻璃厂等。可以说，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部分玻璃厂、都是“麓山”、“宝华”撒出去的种子。

（刘晓华记录整理）

我所知道的生生农场

肖彦农

二十年代，父亲肖泽（号丽生）在从事玻璃制造事业的同时，又在长沙南郊陈家垅（今大托乡新路村）购山地三百多亩，雇工垦发，遍植油茶。至三十年代中期，将部分油茶砍去，改种果树、花木。父亲因有感于当时国家工农业落后，为勉励后辈奋斗，故将此处取名生生农场，取其生生不息之义。

农场有房屋三栋：一栋为长方形两层楼住房（此房至今尚存、在大托飞机场内），占地面积约二百多平方米，一栋为厨房和杂屋；一栋为谷米加工房。住房最大，住房楼上有一间房为父亲书房兼实验室。房内珍藏有古玩、字画，工农业生产书籍；还有试验台，他曾在此进行过玻璃配方、蜜桔和花生三粒肉选种、白沙枇杷和大红袍枇杷人工授粉杂交等试验。住房西头有一间土温室，一半在地下、一半高出平地，周围镶嵌大玻璃窗子。蜜蜂和热带花卉在此越冬，木耳、香菇、草菇等菌种也在此培育。住房四周植有苍松翠柏，盆景花卉四季常青，并养有画眉、白燕等珍禽。住房附近有大片放牧场地，常年饲养桃源鸡、来克亨鸡两百多只，还有蜜蜂数群。门前大圹养鱼，另辟一小池养有金鱼。农场鸡、鱼、猪肉、食糖自食后尚有余剩。

父亲因主要精力用于工业，农场则长期专聘刘福照（亲戚）协理。另雇二人做饭养猪，四人培育林木。农忙时临时雇请工人。农场工人皆为本家或亲戚，劳动报酬优厚，生活较为丰裕。

场地种植布局按品种分区，各区株行横直成线，各区之间有人行道。全部种植区周围建有壕基防护，内外均有排水沟。一条千米长的简易公路通外，与长潭公路相接，运输方便。

全场按果树品种分六个区，以无核蜜桔为主，约计共占地面积百余亩。其中，种有蜜桔六千多株，梨一千多株，水蜜桃三千多株，枇杷五百多株，柿、板栗等杂果一千多株。果园造好后，苗小空隙大。又利用隙地套种除虫菊约六十余亩。该花原产日本，其种子系父亲从上海购回，种植后年产干花三千余斤，每斤价值光洋两元。此干花粉碎后为配制驱蚊除虫重要原料，当时市内有一姓张的商人来场定购，配以其他原料，制成一种特效驱蚊香，销售市面，赢利不少。除虫菊种植三年，盛花时遍山洁白，人们誉称生生农场为肖家花园。

数年后，各品种果树先后结实。所种水蜜桃均用胶浸纸袋套果，成熟后，果汁如蜜，果皮颜色特别鲜艳美观，运销香港，价高几十倍。其它果品销售本市的，一般由大西门义码头商贩趸批运走，也有外地商人来场采购。

果树项目内，接着又新辟十多亩苗圃，培育无核蜜桔、水蜜桃等果树苗约十多万株，大部分销售于省内几县镇和湖北、江西等地，少部分则分赠园艺爱好者及亲友。

果园内另辟一花田，以栽培建兰为主，其他草本花亦名目繁多，均可作为盆景。

一九四四年长沙沦陷，该场生产受到破坏，果园荒芜，

损失不小。抗战胜利后，旋即恢复生产，精心培育花木、果树，逐渐达到原状。一九四七年我从开物农校毕业回家，襄理农场事务，直至长沙和平解放。

一九五0年春，父亲将该场全部财物献给人民政府，由长沙市城建局农林科办理接收。原农场花木、果树，大多移植于烈士公园内，供游客欣赏。

开拓园林　美化城郊

——记陈熹生前部分事迹

陈自光　陈自如*

父亲陈熹，字企濂（1895——1965），解放前曾就读雅礼大学预科，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他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一农、高农及群治农商专科学校农科主任，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一中、一师等校教员，广雅中学、浏阳金江中学校长，南岳林垦局长等职。解放后，任省城市规划委员会、长沙市建设局、株州市建设局工程师。他毕生从事农业教育及园艺工作，为开拓我省果树生产和园林建设作过有益的贡献。

民国初期，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落后，果树和园林基础尤为薄弱。父亲在当时少数知识分子提倡"振兴实业"的思想影响下，积极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力主园艺事业面向大众，讲求实效。他利用教学之余，在长沙市北郊丝茅冲租地垦荒十余亩，建立开源种植公司，引进良种果树及庭园苗木。后因该地不能长期使用，于一九三五年在家乡浏阳柏嘉乡铃泗洲中洲培育果木的同时，另择长沙市北郊周家嘴四方坪（今郊区福安乡先福村）垦荒自办园艺场，经当时国民政府农林部备案，定名"企园农场"，是我省成立较早的

* 陈自光系长沙县政协副主席，陈自如系沅陵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以果树生产为主的私营农场。场地面积二十四亩。四周栽有风景树，修筑环园道，挖养鱼池扩两口，堆积二丈多高的假山一座。场内分区栽植果树、花卉、苗木。先后从日本、江浙、广东等地引进桔、梨、梅、桃、葡萄等四十多个品种。如柑桔类有宫川、早生温州、黄岩、南丰、沙田、新会等；梨类有二宫白、长十郎、今村秋、秋白、鸭梨等；桃类有奉化水蜜、天津水蜜、蟠桃、象牙白等。通过十多年试种，选育出适宜本省栽培的质优、丰产的二十多个良种。至一九五三年底，先后繁殖推广果苗约二十多万株，其中主要是无核蜜柑，分布在长沙、浏阳、湘潭、宁乡、望城，远及湖北、江西、广西等地。父亲在长期果树栽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嫁接育苗、整枝修剪、防治病虫、果实贮藏等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对柑桔产稳丰产方面，掌握了较好的技术措施，基本上克服了柑桔大小年结果不均衡的现象。如大田所植宫川无核蜜柑，一般株产一、二百斤，果实皮薄，香甜微酸，渣少无核。一九五一年我省首届农业展览会上，展出企园农场的宫川无核蜜柑、浏阳金柑植株及果实有关图片，深受群众赞赏。一九五0年及一九五一年，父亲寄赠宫川无核蜜柑给毛主席和徐特老，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复信致谢。长沙和平解放后，企园农场仍由原主经营，父亲率家人坚持培育，未尝稍懈。一九五四年，父亲由烈士公园调株州市园林管理处工作，四方坪果园无力经营，经与当地协商，转让农业社。由于乏人培管，果木随即败坏、荡然无存，殊为可惜。

父亲是我省园林绿化事业开拓者之一。他先后规划设计的公园和农林场有十多处。一九三四年曾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邀，设计"蓉园"。该园初供何私人享用，因造型高

超，成为名园，要求参观者日多，乃向外开放而成公园。"蓉园"在市郊，座落小吴门外(今湖南省委大院)，全园面积约一百五十亩。父亲为此曾去日本、香港、及京、沪、杭等地观摩，设计时仿苏、杭园林结构，聚四时著名花木，布置山、石、林、池，营造亭、阁、廊、轩，曲折盘旋，风景幽美，为当时著名的游览场所。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父亲任南岳林垦局长，适日军进犯，财政拮据。他和全局员工茹苦含辛，垦复荒山，兴建林场，并在主要干道遍植行道树，在半山亭、磨镜台、烈士陵园等处广造风景林。南岳前山后山，环绕近百里，层林尽染，常年碧透，时人称南岳为"避难"胜地。当时，抗日战事日紧，烽烟四起，豺虎横行。他恶世俗与人争利，辞职回乡务农，提倡大家与地分利。他慨然把自己培育成功的无核蜜桔苗木，分赠长沙城郊和浏阳老家的乡邻友好。因此，无核蜜桔得以广为传播，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种植面积逐渐扩大。

解放后，父亲由浏阳调省城市规划设计委员会，旋派筹建烈士公园（原文艺区辖境），负责设计工作。其园林结构大多是他和设计组的同志共同研究布局的。一九五五年，他又选取了烈士公园结构和造型等某些优点，在株州市中心设计兴建公园（今奔龙公园），并另建苗圃一处，今已郁郁葱葱，可与长沙比美。

父亲在主持长沙市园林培养所时，在天心公园主办园林技术培训班，定期讲授果树、庭园、花卉课，先后培训园林职工和城乡果木花卉爱好者一百二十多人。企园傍市郊、假日来园参观者，无不热情接待，若有函询果树栽植、庭园设计事项，他都真诚推介或亲往指导。父亲生活俭朴，粗茶淡

饭，淡泊利禄。自营企园十多年，草帽布鞋，日与园林为伍。他一双厚茧的手，持枝剪，握锄头，往来田圃之间，体现了他爱劳动、有毅力的品格。在蓉园、烈士公园以及丝茅冲等地方，他流过不少辛勤的汗水，为郊区的园林建设和果树生产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长沙利民锑矿的纠葛

陈昆煌*

岳麓山又名灵麓峰，乃衡岳七十二峰之一。这里群峰叠翠，林壑幽美，自然风光，极为秀丽。而在岳麓后山之谭家冲（今长沙郊区岳麓山乡茶场境内），还蕴藏着锑矿，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陈姓家族集资，一度开采。

谭家冲是陈姓祖茔之地。曾任江南福山提督军门的陈海鹏于民国四年（1915年）病逝长沙，即葬于此。在抗日战争时因挖掘战壕，将墓地破坏。陈海鹏之子陈志清、陈文宪，在修复墓地时，挖出锑矿矿苗。经当时任湖南大学地质系主任胡安恂教授勘测，储藏量估约二十万吨。陈志清等乃于抗战胜利后向湖南省建设厅申请开采权。该厅批复，应转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此时，资源委员会驻湘办事处处长刘基磐（现年八十、在中南工业大学任教）未经陈志清同意，率领武装矿警强行开采。陈志清阻止无效，向陈氏宗祠总祠求援。总祠常委陈嘉会等出面，央请当时国大代表仇鳌、文任武等向资源委员会说明情况。后经省建设厅、长沙市政府出面调解，议定谭家山之矿由陈氏开采，并转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陈氏家族推我负责筹备，集资银元两万元，定名为长沙利民锑矿公司，组成董事会，陈申传为董事长，我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陈志清任董事兼副经理。聘请胡安恂为总

* 陈昆煌系长沙市工商联合会顾问。

工程师。公司设于岳麓后山李家大屋，并在长沙市潮宗街志诚米厂内设驻城办事处。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正式开采。我们开矿所购民房菜地，都与地方协商解决，公平交易，皆大欢喜。并以招标形式雇工开采，按量计算工资，锑由资源委员会统购。但该会只收纯锑，遂另建炼厂，每日能提炼纯锑一吨多。由于收购价格太低，加上货币贬值，以致生产难图发展。更由于矿井掘进日深，大型抽水机械之购置，坑道支撑杠木之耗用，资金周转欠灵，撑持到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一九五〇年，公司申请人民政府接管，当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拨款作为清理员工费用，长沙利民锑矿公司遂告结束。

我成长的摇篮——"一中"

梁宜苏*

现在长沙清水塘（军路侧）的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其前身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简称"一中"）。一中可分三个阶段：抗战前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和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简称"长高"），抗战时在安化县桥头河（现涟源县）的湖南省立临时中学（简称"临中"）和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初期在长沙清水塘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我是一九三0年春考入一中初中部第九班的一名学生，一九三二年冬，初中毕业后因故休学一期，一九三三年秋再度进入长高普通科第十九班，至一九三六年夏毕业，为时共六年半。这虽是半个世纪前的城南往事，但因我对这阶段学校的情况比较熟悉，至今仍有深刻的记忆。

学校环境

我入校时，学校坐落在长沙南郊妙高峰山下西南角书院坪（原城南书院旧址，今省立第一师范）。出学校前门往左是大椿桥，往右是惜阴街。惜阴街的名称大概是和书院学生奋发求学、爱寸阴、惜分阴相关联的勉励之词，沿惜阴街近北端处，有一条与之相接成丁字形往西的街道，叫灵官渡，古称

*梁宜苏系湖南省博物馆离休干部。

朱张渡，相传是宋代岳麓书院的朱熹先生和城南书院的张栻先生，因交往讲学，经常从这渡口横渡湘江而命名的。

学校校舍规模宏大，屋宇宽敞，环境幽静，是一处适宜于青年求学进修的好地方。校门前一块宽坪，有整个书院坪一条街道的长度。坪地分设有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靠外面临街的围墙处，栽有一列刺瑰。整个学校四周用砖墙围着。校舍的西北角通网球场处，有一个内操场，雨天，我们在这里进行体育活动。校舍后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后操场，是田劲运动和足球练习的场地。后操场的北端有一片丛林，围墙外便是妙高峰中学。

学校房屋可划为五个区，除办公楼和大礼堂为工字形排列外，其余如教室、自修室、寝室、大食堂、厨房等，大多是土洋结合的四合院。各院和各栋房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雨天不用撑伞能走遍整个校舍。各院落中间的余坪空地，大都建有天井、水池、花坛、假山和亭榭，其中栽植着梧桐、芭蕉、石榴、腊梅、女贞等花木。办公室与大礼堂相通的走廊两侧各有一亭，一名"坐雨"，一名"听风"。另外，在教员休息室与教室的夹角处也有一亭，亭名"有所思"。沿办公楼至教室区的底层走廊墙上，嵌砌着一些石刻碑文，上记载着有关从书院到改学校的历史变迁情况。

教学管理

这一阶段，学校教学组织分小学部、中学部两个部分。小学部在进大门的右端，约占全校四分之一的面积。小学部称"一中附小"，负责人称主事，不称校长。中学部校长并不过问小学部的事，这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中学部最初有高中部普通科、高中部师范科和初中部三个组成部分。我考进学校以后，初中部不再招生了。到我初中毕了业，初中部就完全停办，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

一中和长高这一时期(1927——1938)先后任过校长的，有吴剑真（现农工民主党成员)、缪育南、余先砺、彭晋云和吴晦华先生。著名的教师有李肖聃、张平子、邱楚良、张幹、文亚文、汪馁华、魏先朴、许汝赓、郭昆、刘炳荣、文士员、方奎、曹绍春、葛琴轩、曾福盛等先生。他们都是省教育界的知名之士，学校又为公办，收费较低，因而来校报考的学生很多。每期取录新生只有五十至一百名，报考的就达千人左右。入学以后，校风淳朴勤奋，学术研究空气浓厚，教职员培养辅导有方，学习成绩斐然。毕业的学生无论是升学或就业，都有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作基础。再经锻炼或深造，大都成为有用之才。如从事学术研究而有重大成就的，有著名历史学家黎澍（黎树苍）、著名文学家康濯（毛季常）以及在美国的红学家周策纵等。从事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则有周应铭、王德恒、申时夏、曹介夫、曾昭璭，唐士蘋等同学。

民主风气

我们学校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自治会通过选举产生的干事会去开展各项活动。干事会分总务（主席）、文书（秘书）、组织、财务、学术、交际、游艺、体育、膳事、合作等股，每股设干事一至二人。各股下面又有选举产生或自愿组合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合作社、膳事委员会、民众学校

（师范科同学教学实习）、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美术研究会、求真科学社等。每个同学都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组织的活动，来培养志趣，发挥特长，研究学术，探讨问题。在这个小小的社会里，各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学之间都是平等的地位。我们流传着一句有名的口头禅：“有理的服从，无理的反对！”

革命传统

一中原在省教育会坪（今省文化厅所在地），书院坪原是省立一师校址。“马日事变”后两校对换搬迁，省立一师民主革命的传统在一中潜流传播。我入校那年秋天，红军一度进驻长沙。红军有一营兵力分驻在一中和妙高峰中学，指挥所就设在妙高峰游路上亭子里，扼守着从南面而来的粤汉铁路和湘江的关口隘道。当时的湘江江面，停泊着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那次日舰竟公然向妙高峰游路亭子红军指挥所开炮轰击。一发炮弹落在我们一中大礼堂的南端，屋顶被炸开一个窟窿，把礼堂的讲台也炸烂。红军撤走时留下一颗种子——周应铭同学，又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十月某日便遭逮捕。十一月下旬，在识字岭壮烈牺牲。次年春季，被日炮毁损的大礼堂还来不及修缮，开学典礼只好改在它的北端举行。同学们一谈起这些事情，无不感到耻辱和愤怒。每逢国耻纪念日或国家重大节日，都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地聚会，指斥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欺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将东北三省奉送日本军阀。一中同学闻此消息，悲愤异常。一面联合长沙市各校，组织“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一面

联名上书国民党省政当局，请缨杀敌。同时，我们要求派遣军训教官来校教授军事课程，使能学习军事知识及技术，以图报国雪耻。但是，省政当局虽然成立“湖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派遣军事教官到长沙市各中学对学生实施军训，却秉承上级命令，雷厉风行地解散“湖南人民抗日救国会”和“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打击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并以所谓军纪、军令控制学生，不准进行抗日活动。一中学生在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坚持“有理的服从，无理的反对”这一原则，面对着“军令如山”和“绝对服从”的军纪，采取了“绝对服从”实则消极抵抗的办法，使得历任军训主任和军事教官在每学期大检阅中闹出笑话。而且，师范科第九班全体同学并与军事教官公开对抗，在考试时撕毁试卷，冲出教室。教育厅得知后恼羞成怒，开除师范科第九班全体学生，并勒令“长高学生自治会停止活动，永远不得恢复”。

党组活动

一九三四年秋，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担任情报员和交通员，负责搜集情报和收取、传送各种机密文件。当时的转信站就设在长高。一九三五年秋，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后，上海的“党中央特科”领导机关来了指示，要我们“长沙工作组”在执行主要任务（情报工作）的同时，要注意青年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于是，长沙工作组领导人刘道衡、赵君实、熊子烈、曹治阳等同志进行研究，决定以赵君实为书记，刘少慕、梁铁素为成员，在工作组下成立“青年运动党团”，领导长沙青年运动。我们的“青年运动党团”又组织了“反日大同盟”作为外围组织，以党团所掌握“的新

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领导）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为基础，吸收长沙新闻界、各学校进步分子为盟员，开展抗日宣传的活动。“大同盟”在我们长高发展了何作人、曾昭题、徐南屏三个盟员。我们四人在学校建立了小组。

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我们党团通过“反日大同盟”盟员在长沙各校进行酝酿，发动响应。长高立即成了这次运动的根据地和指挥所。党团书记赵君实根据上级指示，掌握全面情况，向我们布置任务，授以策略机宜。十五、六日，我们秘密地在学校贴出了“反日大同盟”的传单。十七日，我们推翻教育厅历史禁令，成立了“长高学生代表会”。接着进行串联活动，发动并组织全市各校学生参加《一二、二〇》示威游行。游行前夕，即十二月十九日晚，朱经农、胡达来长高“训话”，企图压服我们游行。我们向朱提出“政府为什么不抵御外侮？”“我们国家有没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国界？”“我们有没有国防建设？”等问题，进行质问，朱瞠目结舌，无词以答，我们冲出会议室，使他的吓唬欺骗破产。接着教育厅又派主任秘书王灵根前来游说，也被我们揭穿了他的阴谋，把他驳斥得呆若木鸡，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学生代表会开会讨论、表决，直到全体同学整队出发，他才灰溜溜地逃走。于是，在我们长高学生的带动下，十二月十日，全市各校学生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前后，《大公报》作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新闻报导。长高学生代表会正式去公函责成该报作出了更正。总之，在这次运动中，长高学生显示了卓越的胆识和组织才能，取代了全省最高学府湖大的地位，而成为“学联筹备处”主要负责者——总务（主席），大振声威。

但是，示威游行过后，当局却多次对长高进行报复。如解聘进步教师邱楚良，迫害戴淦中、薛国安等进步同学，校长吴晦华、教育厅科长夏开权和国民党甲派骨干王庭辉三人，还先后找梁铁素个别谈话，进行威吓……。类似这样的情事不断发生，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才有所收敛。抗战开始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全国救亡运动高涨。长高在武汉政局紧张的情况下迁移至安化县桥头河，大部分同学随迁下乡，一面学习，一面在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散播革命种子；也有同学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抗日；还有一些同学北上延安学习，去寻求革命真理。

一中是我成长的摇篮，我深深地怀念着她。许多同学也从这里踏出校门，迈着坚实的脚步，走上了自己的征程。现在，大家都已两鬓斑白而殊途同归，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和四化建设争作贡献。真是：丹枫金菊无衰态，幽草桑榆夕照明。

修业农校与彭国钧

彭先河·

修业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学校，创办于一九0三年。学校原有小学部、中学部，一九二0年停办中学部，改办农业部。一九二三年农业部在长沙南郊新开铺开学。一九五0年修业农校（以下简称"修农"）由省农林厅接办。一九五一年迁东区韭菜园。除抗战期间疏散到安化外，修农大部时间设在新开铺。关于修业学校创办时的历史背景和艰苦兴学情况，何积烺已撰写《创办修业学校的艰苦经历》一文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上刊出，本文不再赘述。我是修业校友，在新开铺中学部读过书，且由于家庭关系，对修农史实略知一二，特记叙于下，若有遗漏或错误，请知情者补充、订正。

筹建农业部 扎根熊家冲

彭国钧(起义人员，1877——1952)是我父亲，于一九〇五年来修业任教，一九〇七年任小学部堂长（又称主事），次年任修业校长。一九一八年，他赴北京参加全国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得知全国教育结构情况，普通中学较多，大专院校寥寥可数。而中学生毕业后升学困难，又缺乏就业能力，成为社会及家庭沉重包袱。湖南情况更为突出，应当减少普通中学，多办职业中学，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湖南是鱼米之乡，稻谷、苎麻、茶叶、柑桔、生猪等产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全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靠农业维持生活。然而，当时全省农业职业学校只有省立高农、岳阳湖滨和长沙开物等几所初级农校，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形势的需要。因此，创办农业职业学校实为当务之急。会议闭幕，他回到长沙，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教育界人士及修业学校校董们商量，深得大家支持。

筹建农业部需要资金和场地，就当时该校经济条件来说，决非易事。一九二0年春，父亲因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被张撤职，便赴上海向旅沪湘人聂云台（曾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已故）募款，筹集办学资金。适聂所经营的纱厂失败，枉此一行。七月，父亲回湘，复任校长。八月，校董会决定停办中学部，推狄昂人（省参事，已故）具体负责筹办农业部工作。十一月，父亲奉派赴武昌担任旅鄂湖南中学校长，辞修业职。王震东继任校长，筹建农业部工作继续进行。校董会决定，将都正街中学部校址出售，以充农业部建校经费。购南郊新开铺熊家冲田庄，计有水田及山地共三百三十五亩。着手兴建校舍，开辟农场。至此，筹建农业部工作告一段落。

艰苦办学 面向社会

一九二三年春，农业部开学，狄昂人任主事。招收高小（即现在的完小）毕业生，肄业三年，系初级农校。设有植棉、园艺两个专业。私立学校主要靠学生学费维持，政府虽略有补助，还经常拖欠。农业部创办伊始，学生人数不多，

• 彭先河系郴州卷烟厂退休干部。

学费收入很少，经费异常拮据。学校便在新开铺恢复中学部，增加学费收入，解决经费困难。一九二五年狄昂人任校长。一九二七年父亲复任校长，不赞成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立即停办中学部，提高农业部质量，以争取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他鼓励师生发扬修业学校的“习劳耐苦，崇实尚朴”和“愈穷愈振”传统，度过难关。教学方面仿日本农学实科学制，新生肄业四年，不分专业。授以农学基础知识及操作技能，要求学生毕业后能独立经营一般规模的农业生产。并开办棉稻试验场，便利教学、科研及学生实习，由先兄先泽（后任浙江大学教授，已故）担任主事兼场长。一九二九年又在南县安仁垸租地五十亩为棉作分场，新开铺试验场专供水稻栽培及育种之用，加强对水稻改良的科研工作。同年，以“湖南私立修业农校”校名申请政府备案，不称修业学校农业部。一九三二年姚舜生（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农校副校长、校长，已故）继任主事兼场长。父亲看到修农已组成一支好的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也逐渐充实，遂于一九三三年停止农学实科招生，按本国学制改办高级农校，招收初中毕业生，肄业三年，当时称高农，即现在的农业中专。初设农艺、农村师资两个专业，以后根据社会需要，增设园艺、农村合作两个专业。从此，学校规模粗具，在校学生人数保持两百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奉中央教育部令，改名为“湖南私立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并设副校长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姚舜生担任此职。

修农的教学特点是联系实际，结合科研，服务生产，提倡手脑并用。父亲常说：“蓑衣、斗笠是我们的制服，锄头、扁担、粪桶是我们的工具，镰刀、枝剪是我们的武器，

纸、笔、墨、砚是我们的宝贝。”师生赤脚草鞋，主动深入稻田、园圃，与农场工人一同操作，从事各项劳动，并进行田间观察、记载。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劳动习惯和自食其力的思想及能力，学校还给每个学生划一小块土地，面积约四分之一亩，让他们种植作物，所得的三分之二归自己，一般可够三个月伙食费。这样，更鼓励他们对农事的关心。因此，黄昏时候仍有人在田圃劳动。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已故）来校视察，看见师生的劳动热情，深有感慨地说：“办农业学校是难得有此精神。”水稻品种的培育改良也有成效，先后培育出“小南粘”、“粒谷早”、“修农一号”、“修农二号”等优良品种，在全省推广，取得了增产效益。当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杂志《独立评论》第八十期上，有专文介绍，说“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学校出版的学报《修农月刊》发表的水稻育种试验报告，常为学术界引用。学生毕业，有的考入著名大学如北平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就业的由于深入基层，胜任对口工作，很受社会欢迎。毕业生中没有待业的。因此，修农得到各界赞许，省教育厅增加了对学校的补助。一九二七年，省建设厅对试验场给予常年补助四千元。一九二九年中央农矿部对试验场给予常年补助每月一千元。一九三四年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学校三万元。学校经费较丰，得以陆续增建校舍，扩充农场，添置图书、仪器等教学和科研设备。至此，自有农场面积达四百多亩，图书万余册，标本二千余件，仪器有万分之一的精密天平，学生实习用的显微镜每人一台，教学、科研条件大为改善。

新开铺是原长潭公路旁一个偏辟小镇，熊家冲只有一片

水田和几座光秃秃的山丘。农业部建立后，在山上植树造林，在平地开辟园圃，修浚池塘，依山修建房屋。几年之后这里面貌大大改观。山上郁郁葱葱，园中奇花斗艳，更有修竹成荫，小桥曲折。登高眺望，但见田野开阔，阡陌纵横，四季风景如画，又是一番景象。因此，市民来郊游，学生来远足，成为南郊风景。学校商得开明汽车公司（私营，解放后停业）同意，开辟"天心阁——新开铺"专线，每小时开出两班，便利游客与学校师生来往，新开铺市面也随之兴旺。

修农为社会服务做了不少工作。建校时，新开铺只有私塾，学童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知识面较窄。学生会开办平民半日学校，招收附近儿童入学，授以现代教育。一九三三年学校开设师资科，附设实验小学供学生实习，小学增设珠算及农业知识课程，很受家长欢迎。一九三四年，学校为了普及农村文化知识，推广医疗卫生，提高人民素质，改变农村面貌，与省民众教育馆合作，呈请市政府批准，组织"长沙南郊乡村改进会"。父亲任主任。除医务人员由长沙市卫生局调派外，其他工作人员均由修农师生担任。以新开铺、猴子石、百家河为改进工作区，会址设新开铺，有图书室、文娱室及医务所。图书室备有文化、时事、科普等通俗读物多种，供当地民众阅览。又设置巡回文库车二辆，定期送书上门，以便工作区远处农民借阅。文娱室备有茶水、棋子、乐器，并定期编写墙报，放映幻灯，宣传时事和科普、卫生保健知识。医务所开设门诊。又在新开铺、猴子石、百家河三个小镇上设立民众学校，免费招收当地民众入学，下午或晚上上课，由师资科学生前往教学。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修农疏散往安化，这五年对当地

普及文化、破除迷信、推广医疗保健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西迁安化　坚持教学

一九三八年，日寇逼近湖南。七月，学校奉令疏散。八月，迁至安化东坪。先在东坪下游十五里处的硒州租佃谌姓茶行作校址。九月，照常开课。父亲因安化有一千年产茶历史，茶叶为当地主要经济作物，东坪又是茶叶集散中心，这里是理想的研究茶叶栽培及加工的地方，遂于次年春购置茶园四十亩筹设茶科，培育这方面人才，以图我国茶叶生产的复兴。修农是全国高农开设茶科的第一所学校，这方面师资缺乏，只好挖掘现有师资潜力，聘请经营茶叶的专家，访问有经验的老茶农，集思广益，组织教学力量。并由合作科师生协助附近茶农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又开办修农茶场，以资配合。经半年筹备，茶科在八月开课，师生都很满意。一九四0年末，购东坪对河褒嘉村山田一千余亩为校址，开辟园艺、稻作、茶叶、林木四个农场。在东坪收购茶行房屋，拆迁到褒嘉村架立（山区房屋一般都系木结构），作为教室及宿舍。一九四三年初，学校全部搬入新址。茶科开课后，师生组织茶叶研究会，研究茶树栽培及茶叶加工技术，编印《芙蓉月刊》，发表研究文章。一九四二年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拨给湘茶改良费折合银元二千五百元（按湖南省志编委规定的折合率换算，以后同），这年茶科师生制成红茶一千箱、黑茶七十大包，都由贸委会中国茶叶公司收购。茶科学生又研制成功手摇木质揉茶机，使制茶工艺向半机械化发展。同年，湖南农业改进所以修农改良稻种，促进了生产，

委托学校推广水稻良种，责以安化、新化、益阳等县增产任务。姚副校长以该所督导员身份，带领学生到各县进行推广工作。学校四十周年校庆，省政府特别补助银元五千元，父亲用以添置教学设备，订购图书杂志。在此艰难岁月里，保证教学及科研工作持续进行。

日寇入侵，父亲教导学生抵御外侮，安排军事训练，使学生除了会拿笔杆、锄头之外，也能持枪卫国。制订“锄头、笔杆、枪支”三个图案围成一个三角形内写“修业农校”四个字的校徽，提高学生奋发图强壮志。学生会在褒嘉村办民众夜校，在东坪群力纺织厂办妇女班，办“流动教学”，教师每晚定时定点到农户登门上课，普及文化，宣传抗战。又组织代耕团替附近出征军人家属和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耕种。图书室备有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使其了解时事，坚定胜利信心。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校内尚是比较自由的天地。一九三九年夏，学校发生一件不幸的事：合作科主任王德衡（毛主席姨表兄王季范之子），思想进步，言论无所顾虑，为号称“东坪王”的军统特务、东坪警察所长蒋本支注目。当时蒋介石对共产党磨擦虽日益加剧，但表面上仍未扯下国共合作的幌子。蒋本支惮于我父亲在社会上的声望，不敢贸然来修农下手。然侦伺不遗余力，王德衡也惴惴不安。父亲鉴于形势严重，劝王德衡转移到先兄先泽主持的安化茶厂暂避，而王与其爱人秘密雇舟，不辞而别。蒋本支乘机派便衣追踪，王舟夜泊安化与益阳（今桃江）交界的善溪口，被匪闯入舟中击毙。报案追查，迄无下落，直到解放时蒋本支率部顽抗被捕，才真象大白。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湘北沦陷，陷区学生约百人家庭经

济来源中断。国民党政府虽许诺救济，然而层层中饱，办事拖延，望梅不能止渴。父亲作出决定：一、学校垫借食米维持伙食，以政府的救济米扣还；二、学校拨出一些土地，组织他们课余种菜，挑到东坪街上出卖，收入作伙食之用；三、动员非陷区学生捐助伙食结余；四、学校出面向社会求助。有一次长沙地区的两个学生患病，学校派人到东坪请医生，代付医药费，并组织学生护理，象对家人一样照顾。为了维持学生伙食，学校垫出食米有二百二十七石没有收回，由学校负担了。这段时间陷区学生在校的衣食无缺，生活安定，照常求学，毕业的也参加了工作。而与此同时，许多学校的湘北学生颠沛流离，甚至丧生异地，真不可同日而语。

大抓战后复元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学校着手复元回长沙。而新开铺校舍全毁于战祸，遍地瓦砾，荒草没径。学校伐木编筏，将褒嘉村房拆屋卸水运到长沙猴子石，再搬到新开铺架立。次年二月及时复课。早在三十年代，父亲觉得发展祖国农业需要高级技术人才，而两湖大专院校未设农科，修农已具备扩展为农科大专条件，于是在一片废墟上按大专规模设想建校蓝图。根据学校财力逐步兴建，先修教学大楼。为节约经费，由校友王××（名字记不起了）工程师设计，学校派人备料。校友王敬之（新开铺实验小学毕业，已故）承包施工。年逾古稀的父亲冒着严寒酷暑，奔走城乡，核计用费，检查工程。秋季，这栋砖木结构的三层大楼竣工。又以由安化搬来的木结构房屋为生活用房，将褒嘉村校园改为茶科实习茶场(今安化茶场)，全校教学及师生生活，重新走上正轨。

抗战时期，修农接受美国民间组织“美国援华联合会”委托，成立“湖南农村重建服务处”，协助本省遭受战祸的贫困农民重建家园，父亲兼任主任。曾在益阳、常德试办，因日寇大举犯湘，工作中断。一九四六年一月，服务处由东坪迁长沙开展工作。当时政府规定农贷只能由“中央合作金库”和各省的省银行办理。经商得各方同意，划长沙的望岳乡和常德的上德、卷善两乡，南县的昭民、仁义、协安三乡，岳阳的青岗、超奎两乡为服务处工作范围。于是，在上述四县设立工作站，派合作科师生前往调查农民受灾情况，协助确实无力恢复生产的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发放耕牛、种籽、肥料、塘坝贷款，组社时排除保、甲长插手。因币值不稳定，物价不断上涨，一律贷给实物。实物由服务处供应，不经商人之手，以免从中剥削，社员可受到实惠。同时，工作站就近进行技术指导，钱都用在刀刃上。八个乡共计贷款折合银元十一万多元。

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赠送修农英国种奶牛十二头，供教学及繁殖推广之用。我陪同该署美籍农业专家约翰逊来校了解学校教学情况及饲养能力，并由姚副校长会同选择牛舍场地，认为满意。父亲亲自带饲养员熊某到上海领牛。聘请学习兽医的校友负责管理，按科学方法建筑牛舍，安装鲜奶蒸气消毒的先进设备，开设奶牛场，并组织学生现场教学。每日凌晨奶牛场派专人将鲜奶送往湘雅（今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仁术（今省人民医院）、德生（今工人医院）等医院及私人订户。第二年开始生育小犊，奶牛繁殖势头很好。在当时，这算是长沙市唯一略具规模的奶牛场（据我所知，长沙市有奶牛始于清末西人传教士的输入，开始仅挤奶供自已饮用，后经西人教会办的医院及学校工作人员之手，才产生个别养牛户）。

人民政府接办前后

父亲年迈体衰，一九四九年八月告退，由丁鹏翥（已故）继任校长，校务由姚副校长主持。湖南和平解放后，修农呈请人民政府接办。一九五0年四月，省农林厅接办后改名为“湖南修业农业专科学校”。由厅长李毅之兼校长，姚舜生任副校长。修农自开办以来到政府接办，共有毕业生一千多人，遍布大江南北，在农业界有一定影响。现在担任教授、研究员及高级农艺师的，不乏其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该校与湖南农学院合并，成为该院高农部，迁东区韭菜园（新开铺校址后来成为长沙机床厂宿舍区）。一九五二年九月，将岳阳湖滨农校合并。十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农林部联合通知，正式命名为“湖南省长沙农业学校”，从农学院分出来，迁东塘。一九五四年上期，又将郴州农校、津市农校、开物农校合并。一九五七年再迁东湖姚家坨。规模陆续扩大，成为我国重点农校之一。

最后，引用修农植棉科毕业的校友王首道(在校名王芳林)一九五七年写给母校老师姚舜生信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记得修业农校过去曾有‘穷学校’之称。当然，这在当时某些人士的心目中是一种‘瞧不起’之意，然而，从今天勤俭建国的观点来看，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是一种美德。虽然今天的条件较之过去当然已好得多，但是那种艰苦建校的精神，却依然值得发扬。”

一九八六年国庆于郴州市

私立咸嘉小学早期办学情况

吴肖宗*

创办时的历史背景

民国初期，长沙县云母乡（今长沙市西郊）的教育事业极端落后，全乡公、私立学校各只二、三所，都是单级复式的初小。乡的教育经费是由县府在契约税和屠宰税两项税收中附加一点轻微的金额，按各地域税收多少，发给多少。云母乡的地域狭小，两项税收无几，教育经费非常困难。乡承办教育事业的人员也是按县府规定，由本地选举产生，只有一人，叫做学董。任期不限，纯属义务差事。一九二二年冬天，县府派王叔其来云母乡视察学务，他看到本乡教育落后的情况，极为不满。回县府后，建议扣发本乡应领的附加教育经费，要将此款移作县图书馆添置图书之用。恰巧此时胡慎徽（又名文典，已故）先生因事到了县府，听到这个消息，即向王（胡与王曾相识）提出抗议。胡先生对王说："你只能责成本乡把学校办好，不应该把本乡仅有的教育经费扣留移作他用。"王说："那就交给你办，怎么样？"当时，胡先生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于次年春创办私立咸嘉小学（简称"咸嘉"）。继而接任学董，本乡教育事业才逐渐好转（以上所述胡、王对话，是胡先生当年与我闲话中谈及的）。

---

*吴肖宗住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乡观沙岭村。

第一个学期

胡先生家住韩家湖（今名咸嘉湖，属西湖渔场），住宅宽敞而雅致。学校就设在他家里。第一个学期只办高小一个年级，教室在他家东头一间客厅。我入学时已开课两周了，同学有二十多人，座无虚席（胡重午在上辑《追述私立咸嘉小学》一文中说只八人，可能是开学那天的人数）。同学多来自远处，家距学校几里至二三十里，除个别读通学外，其他都寄宿学校。同学年龄一般为十二岁至十七岁。胡重午（长沙市银岭岔小学退休教师）最小，仅九岁。还有两个较小的同学，一是李溉圃，一是罗觉先(解放后任过多年小学校长）。全体同学分甲、乙两组，甲组八人，乙组十多人。这些同学十有九读过几年私塾，语文都有点基础，所以，只英文、算术分甲、乙组，其他各科都一组教授。另外，两位年纪较小的同学读初等国文第四册。易甦箴（又名克懋）先生教授语文、地理、历史。陈先生（记不起名字）教授英文、算术、自然等科。两位先生都是长沙东乡人，教学能循循善诱，讲说清楚。我们听课觉得易懂、好记，学习兴趣浓厚。

改建校舍　增加班次

第一学期终了，胡先生利用暑假期间，改建房屋，以备来期扩班需要。他把住宅东头仓屋、杂屋等几间改建成为一栋因陋就简而又比较完整的校舍，有教室两间、老师住房三间、客房一间、男生宿舍楼房一大间。第二学期开学时，学校分初、高两个班级，各班一教室，各分甲、乙两组，同学共约五十多人。

这学期教师有四人。秀才出身的罗皖生先生教授高小班语文、历史；法政学校毕业的黄同李先生教授高小班英文、自然、算术；胡先生在善化中学同学的罗应先先生，教授初小班语文、常识（罗中途离职，由肖天爵先生继任，也是胡先生同学）；另一位周老先生赞仙是胡先生的老师，专门批改高小班学生作文。高小班的地理、美术等科，由初小班语文教师兼任；初小班算术，由高小班英、算教师兼任。这是教师分课的情况。

这年冬天，县府派王叔其来校视察学务，认为“咸嘉”办学完善，成绩优良，深加赞许。王回县府后具报了情况，县府正式批准“咸嘉”备了案，决定每学期给予一定的经费作补助。

学生逐年毕业　学校蒸蒸日上

一九二四年暑假，高小班同学完成了学业，为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这年下学期，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又在校补习。高小班任教的彭松渠先生，曾在北京某专业学校毕业，擅长英文、数学，教导有方。我留校补习这期，在他的教导下获益匪浅。一九二五年上期，学生增至百多人。胡先生要我留校任教，讲授初小班语文、算术、常识等课。新来黄芷谷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又勤恳、谦虚、善教，备受学生欢迎。其他教师虽略有变动，但人事安排妥当，分工分课合理，学校制度比较健全，教学工作顺利。暑假，高小班学生毕业（第二届），胡重午就是这届毕业生之一。是年寒假，胡先生与我签定来年之约，正当此时，周仁济（现任湖南第一师范副教授、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移家初来

本乡与我家比邻，佛生（仁济的祖父）先生要我到他家教仁济读书。这样一来，我进退维艰了。因佛生先生是先伯父建三清光绪壬寅同年举人，两人交谊深厚；仁济的七叔祖父介祹先生又是我的姑丈，亲友关系密切，情势难却。最后，商得胡先生同意后，我才离校。

我家距校不过十里，离别后仍保持了密切联系（抗战初期又回校任教过）。我是“咸嘉”早期的学生与教师，胡先生严谨治校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师生们潜心教学、团结向上的校风，永远活跃在我美好的记忆里。

长沙市火葬场兴建经过

钱中一*

长沙人民处理死人遗体的方法，在市火葬场兴建以前，绝大多数沿用土葬。埋葬的地点，只有少数名人葬于历代名山的岳麓山上，其他则埋在环城四郊山冈。这些山冈有“义山”和“公山”。“义山”可以任人作冢，一般贫苦人家的多埋于“义山”；“公山”有属在长同乡会的，有属各行业的，如福建四明公山、药铺子公山等，名目繁多。城东的甘棠坡、闵家山、杜家山、浏阳大山；城南的燕子岭、东瓜山、黄土岭、石马铺；城北的伍家岭；河西沿岸等地，遍是“义山”、“公山”。年复一年，冢坟累累，城郊丘陵，景色凄寂。

长沙市火葬场兴建时，佛教设有“化身窑”，可以火化尸体，如南郊的太乙寺和河西的桐溪寺两处即是。但设备简陋，只有僧尼与少数“洋人”（外国人）的尸体送往火化，广大群众不甚了解，更不习惯这种火葬的办法。

设计选址　施工建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改革丧葬旧俗，倡导节约治丧，推行火葬。一九五一年十月，长沙市人民政府接受了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建议，函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长沙市分会配合市建设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局等单位，着手筹建火葬场。

建场设计是长沙市工程公司建筑师谭福元主持，市救济分会干部易志觉、曹孟萍、史正怀等人经办基建事务。在设计之前，曾由救济分会副秘书长黄曾甫邀同市建设局工程师吴开澍、谭福元同到武汉，参考了姑嫂树（日本人所建）火葬场，再依据本市具体情况而进行设计的。当时设计工程拟分三期进行，共建炉九座，第一期先建三座试用。

场址选定在南郊金盆岭江宁公山。这里，山势蜿蜒盘曲，山上有一块平地状若手掌，是南郊的制高点。能俯瞰市区，遥望岳麓山。传说古城防军营盘，吴三桂曾在此作战。场址设在此处，可以避开农民房屋与耕地，也不致污染湘江。设计选址已定，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施工，基建经费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指拨专款五亿元（即人民币五万元），中南军政委员会补助四亿元（即人民币四万元）。按预算节约使用，于一九五三年元月竣工。全场总共用地面积约七千五百平方米，整个建筑面积为六百一十三点四八平方米。建筑规模分为三个单元：办公室、接待室、职工住房、厨房为一组合单元；炉子间、悼唁堂、停尸房、骨灰寄存间为一组合单元；炉子间与办公室之间有一大块绿化地带，门楼联接为另一组合单元。原南站至金盆岭是一条古道，路湾坡陡。在施工过程中，首任长沙市长阎子祥暨市民政局长陆锦同志多次到工地视察，并提出修筑直行线进场公路，以便汽车安全通行。基建中结合市政以工代账方法，新修了进场公路，使整个建筑更为壮观。金盆区副区长王凯延（市人民代表），积

* 钱中一曾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长沙市分会福利组长，也是当时火葬场筹建负责人之一。

极赞助基建，经常深入工地检查；当地群众热心公益事业，给予大力支援，因此，建场工程顺利，质量优良。一九五三年二月，长沙市火葬场正式成立，开始办理业务。

健全制度　节约燃料

火葬场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即开展业务，由长沙市救济分会福利组直接领导。职工人少而精干。第一任主事程前鹄，会计唐跃艺（女），司机段贤望，学徒田××，司炉周明祥、李冬生、曾昭度、黄春生（聋）、黄春生（瘦），全场职工仅九人（绿化临时工在外）。以后，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人员相应增加。邬婉如（女）、张联璧（女）、邓选缙、朱俊堂、彭海清、张揽清、杨茂如等同志均先后调场工作。接着任过主事的有孙迪刚、蒋漱泉、赵绪才、谢超文等。

在经济管理方面，考虑到这是一项新型的社会福利事业，开始会遇到困难，市人民政府采取了自维经费与差额补助结合的方法，并对运尸汽车列为特种用车，不收养路费。火葬的收费标准，经调查其他中等城市火葬收费情况，酌量本市居民一般的生活水平，规定每具收火葬费按成人、少年、幼、婴分为三、五、八、十元四等；运输费市内收十六元，郊外按车公里（低于运输公司标准）计价。婴幼儿免收运输费。对于城市困难户，火葬场不办减免费手续，由街道办事处按二十元的标准补助垫付，后汇报市民政局支付。场里还规定全天二十四小时接办业务，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随时调车派人。由于火葬用费经济，手续简便，当时只须二十元即可办妥一件丧事，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场内工作井井有序。尸体进场后，按入场顺序登记入

册，又按姓氏编入索引簿。司炉人员逐具填写炉间纪录（入、出炉时间，燃料用耗等）。骨灰寄存按姓名、年次编册，发给寄存证明。从尸体入场到骨灰寄存，均有详实记录查考。逾期无人领取的骨灰，代放骨灰井内深葬。

由于实行了节约燃料评奖制度，发挥了司炉工人的积极作用，工作中大见成效。周明祥、黄春生（聋）、罗凤彩等同志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改修炉膛，试调风门，由平均每具耗松柴二百五十公斤，下降到一百五十六公斤。他们进而再改炉子，试烧烟煤，获得成功。后又添用风机，增大风量，取得了最佳效果。每具由耗煤一百三十公斤，降到一百二十五公斤，再次降到八十五公斤。炉温增高到八百至九百摄氏度，骨殖洁白无杂物，超赶杭州炉的先进用煤指标。为了保证工作质量，场又制定以勤观火候、适量添煤、保证炉温、调好风门等内容的操作规程。

增设墓园　扩大机构

火葬场原在南郊公墓黄字号山顶开有集体骨灰井，代葬骨灰。盛满后封口，竖碑留有姓名，以凭悼奠。井台上修筑了仿古式亭子，名曰"悼念亭"。亭上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老人所题"魂兮归来"四个字，其匾额皆毁于十年动乱，今已无存。悼念亭的建筑庄重别致，又富有民族风格，可作公墓风景欣赏。之后，相继又在场区附近的烟坡开辟了第二、第三骨灰井。

火葬虽已推行，但群众中仍有"亡人落土为安"的看法，出现了把骨骶拿去又土葬做墓占地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利用场区山间隙地，开辟墓园，办理

墓葬。墓园内分为塔冢、单冢、双冢三种墓型。第一塔安放骨坛一千个，第二塔安放骨坛两千个，单冢、双冢有五千多个。集体骨井"平地深葬"的方式，更加节约了大量土地，深得群众的支持与乐道。

一九六〇年，长沙市丧葬事务管理处成立，场、处分开，编制增大，加强了全市殡葬工作的管理，并对抬埋运柩工会进行了改革。

优质服务　大力宣传

提倡火葬的新风尚，既不能强而行之，又不能迁就落后。全场职工除认真工作，博取群众信赖以外，特别重视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建场后，曾印发大批资料、设橱窗、放映电影和幻灯片，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火葬的优越性。还先后邀请全市街道基层干部和福利院、休养所老人们及各界人士到场实地参观，并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解答提问。平时敞开大门，热情接待每一个来场参观者。群众耳闻目睹后，消除了顾虑，那些"先榨干、脱衣服……"等流言蜚语，很快得到了澄清。参观的人都认为火葬场干净卫生，说："还是火葬好，不遭白蚁咬。"、"仪式庄重，节约省事。"……三汊矶船员休养所的老人参观后，表态决心火葬，将备用的棺材交休养所处理。长沙知名的和平老人张匹青先生的夫人，寿高耄耋，曾三番两次找街道办事处，要将寿材捐赠政府，自愿百年之后火化。长沙市工商界知名人士亦纷纷捐赠古香古色的红木桌椅、花架，表示极力支持。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回忆从建场开始至一九六六年截止，共火化三万一千九

百零八具。若仍沿用土葬方式来计算一下所耗用的木材、石灰、石碑等物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长沙人民也将被乱坟重重包围，无法从事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火葬的确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革除了旧俗，值得大力提倡。

长沙佛教化身窑—太乙寺

易福申* 口述

我原在老家宁乡沩山做长工，一九四五年光复后因躲壮丁来到长沙。当时我父亲翰章在岳麓山麓山寺做工种菜，认得寺中真如和尚，经他引荐，来到太乙寺（今长沙市南郊雨花亭乡南湖路南湖岭上综合木材厂宿舍区）佃种菜土，方与寺庙和尚打交道，并搞有关火化的全部劳作。今将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光复后寺院概貌

抗战胜利后，太乙寺已残破不堪。杂草掩盖了拾级而登寺前的麻石古道，寺院四周平芜，没有山门，正殿敞露。正殿西首一溜儿五间住房；和尚与寺中佣人占三间，我家住两间。佃户朱振兴（已故）紧挨我家住房搭棚连居。正殿东边有一片平地，两个圆形的“化身窑”在露天立着，其中一个已不能使用。还有一个石砌的弧形建筑物，是存放骨灰坛的，叫“普同塔”，镶嵌在高坳内。寺侧刨木花树下有一口长方形水井，树老朽死不复生，浮根凸出在井畔。井前有一口约半亩水面的鱼塘，塘水主要用于浇菜。

当时寺产有湖田一丘，约计四亩，连年淹没，无法耕耘；另有菜田约两亩，均由张运洪（已故）一家住寺外佃

* 易福申系长沙市郊区副食品生产局退休干部

种。寺附近有山土约一亩多，原佃户谭姓种过玫瑰花，我到寺时已不存在。这块山土由我与朱振兴各半分种。

太乙寺住持的瑞智和尚并不常住寺中，长年守寺的，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工，名叫蒲伢子（与我同乡）的。瑞智和尚不在寺时，蒲伢子每到入夜，奈不住寺中寂寞，更怕闻鼷鼠作作索索声，经常赖在我家闲坐，待午夜过后才回房入睡。

我到寺时，正殿只有如来、弥勒、观音三座神像。一九四七年，瑞智和尚请来五名宁波匠人，用泥塑木（樟木）雕神像一批，历时数月之久。所造神像有的放在寺内供奉，有的（如陶、李公真人等神像）则送到金盆岭龙王庙里去了。

瑞智和尚其人其事

瑞智和尚姓贺，是宁乡贺耀祖的同族兄弟。他一八九六年出生，瘦长身材，中学文化。出家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出家后参拜河西新康杲山寺觉海大和尚为师。兼过杲山寺职务，做过开福寺当家师。太乙寺只是他管辖下的一小庙，间或到此居住。其住室仅有床、柜、桌、椅各一，陈设极为简朴。

我到太乙寺前，身无半文。瑞智和尚声称：不交押金，不得进寺。我不得已只好请朱云章（现湖大职工）、李海明、周六爹担保，以每年六担谷的高利息，向真如和尚借谷二十担，交给瑞智和尚作押金后，才允许进寺种土。当下瑞智和尚还要我写出字据，每月交二机米五斗作为租米。如果逾期未缴，就要马上迁走。

一日，瑞智和尚去杲山寺，要我与朱振兴两个佃户抬

轿。行程四、五十里，中午每人只有四根油条充饥。到达杲山寺后，寺中知客打发轿工各银元两块，瑞智和尚当场代收。回寺后，只给每人米四升了事。那一次，朱振兴正患腹泻，途中受累，又食油条饮生水，回得家来大病一场，险些丧命。另一日，瑞智和尚又要我们抬轿，送其师兄海光和尚从华林寺（谢家桥与莲花桥之间）到桃花寺（龙洞）去。胖墩墩的海光和尚双脚踏在一只盛满热灰的铜烘炉上，压得轿杠忽闪忽闪。到达后，寺中打发我们银元四块，也被瑞智和尚收下。

至于寺中兼营火化的收入，纯系瑞智和尚一人经手，收费多少，我们无可得知。火化的全部工作，从接运尸体，装窑发火，拣骨灰进坛，直至送"普同塔"存放为止，全由朱振兴、张运洪和我承担。瑞智和尚按二十四小时火化一具尸体计算，每人每次只给米六升（相当于九市斤），别无其他报酬。

瑞智和尚整日修行拜佛，为人却如此刻薄。解放初期，政府规定减租退押，他因赖着不给而被农会拘禁。后经龙二爹保释，于一九五〇年出走台湾。

寺庙经营火化情况

太乙寺何时建造，何时开始兼营火化，我不曾查考。但，存放骨坛的建筑物墙上，镌刻有"乙卯冬月榖旦　普同塔　笔架山人书"的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见。由此推算，该寺最迟也在1915年时就已有火化了。住在附近的八旬老人王子贵（现住书院路395号）回忆，他儿时见过寺前出现熊熊烈火，知道是露天火化尸体，都不敢近前观看。之后，寺建

"化身窑"于何时，我也没有考究。

根据我在寺中多年见闻与经历，火化的尸体约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僧尼；二是"洋人"（来传教的外国人）；三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四是流浪者或无力土葬的穷苦人。其中以僧尼最多。

火化工作的一般程序是：先将尸体拧成盘腿坐姿，装入长方形木箱中。再将木箱推进内空直径不足一米的"化身窑"，窑底早已铺好干柴，又用干柴填满箱子四周。然后，关上铁门，开始生火。铁门上，留有一个能开能闭的小圆孔，可以随时观察火色。一天以后，启开铁门，扇走柴灰，按人体上下部位，将骨灰依次（先足部、再身部、后头部）捡入坛中。装好后用生漆封紧坛口。不愿带走的骨坛，则存放在"普同塔"内。

火化过程中的情况：住席草田的张木匠，专制装尸木箱，木质一般，需用时大多往此处购买。也有按规定尺寸自制的，材料都不好。还有，火化一具尸体，一般需干柴三百斤（自备），胖尸需量还要多些。肠肚难化的，则补浇煤油使烬。火化时没有追悼仪式，封门开火后，常有几个手执禘钟的和尚（或尼姑），焚香烧纸，面对"化身窑"边敲、边念，甚至跪拜，说是"超度"亡魂。一般是历时一个钟头左右才离去。骨坛都是自备的。封好后，带回家去的极少。"洋人"的骨坛大多埋在寺右的一块山地上，当地人习惯地称为"洋人山"。骨坛留寺存放的有性别之分。"普同塔"中高约三米，下宽约八米，左右各有一扇小门。塔内进深约五米，偏右一爿小墙将内空分为大小二室。骨坛按男左女右入室，沿山墈紧紧排列，先低层，后高层，每层以土压实，至

解放时已高六、七层了。

有一次，火化一佛教协会负责人，按其要求，将尸体盘坐在底部有眼的陶缸中，上以另一陶缸盖严，装进“化身窑”。窑底铺满薪炭，陶缸周围塞满干柴。封门开火后，因缸底漏尸水，火势不旺，又添薪加炭，烧了四十八个小时。待熄火启开一看，尸体经烟熏火烤，全身焦黑，形同一堆腊肉。只好从缸里取出，重新火化。

一九四七年某日，株州某大工厂来人，邀请我和朱振兴去那里，火化一个已土葬两年的日本女人。我俩到株州，仿太乙寺“化身窑”的结构，在山塝上挖筑窑洞。从筑窑到火化完毕，花了整三天时间。最后，工厂以五斗米酬劳我们，比起瑞智和尚规定的工资又略高了一点。

长沙解放后，太乙寺变成了沙湖乡农会驻地（正殿为沙湖桥小学教室），我当上了农会主席。农会以国家主人公的姿态，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经营火化，为人民服务。一九五二年夏天，我调离沙湖乡，农会一切工作移交副主席张松林主持。事已三、四十年了。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回首太乙寺当年火化情况，再看看今天长沙市火葬场宏伟的建设规模，怎不叫人感到无限欣喜？

（张若曦、李炎坤记录整理）

长沙宁波会馆概况

刘晓华*

解放前，长沙市北郊刘家冲（今浏阳河路）有一个宁波会馆，是宁波人陈雨洲老先生发动在长沙经商的同乡们集资创建的。会馆的设立，给宁波同乡们提供了一个联系与活动的场地，同时，也给其中贫困者解决了生活中的不少困难。

这个会馆分为阳会馆与阴会馆两个部分。阳会馆占地约五百平方米，规模较小。中间有个大厅，是宁波同乡们集会的地方。还有一些杂屋可供办公和住宿。许多比较贫苦的宁波人生了病，没法住进医院，可以免费住在阳会馆治病疗养。

阴会馆面积约有三千二百平方米，规模比阳会馆大几倍，是存放棺木的地方。一些宁波人死了，往往不能马上将尸体运回家乡埋葬，入棺后，便暂时寄存在阴会馆里，待日后运走。阴会馆四周砌着土围子，围内有一间约四百平方米的正屋，开有窗户，比较亮敞。丧家可在这间正屋祭奠死者，开会追悼。土围内建有三座小庙，供奉土地菩萨。还有几间杂屋，盛放备用棺木。阴会馆的主要部分，则是三排停柩间，约占面积两千平方米，共有大大小小四十九个单间。每个单间内可停放一副棺木，棺前除插香火、放烛台外，余地窄狭。间内只有一张小门出进，没有窗户，光线昏暗，阴森森令人恐怖。

---

* 刘晓华系长沙市郊区政府干部

宁波同乡会曾委托黄琴声（宁波人）负责会馆的管理工作。一切帐务和棺木进出登记手续，都由他一手经办。他也定期向同乡会公布帐项收支情况。此外，会馆还雇用四名职工。其中一个叫周佩文，一个叫杨××（名字记不起了），另两名工人因早已死去，不知姓名。周、杨两家都住在阳会馆附近，分租了会馆的菜地种植。两方议定租地不出租金，看守会馆不计报酬。周、杨两人的分工是：周看守阳会馆，杨看守阴会馆。后来杨死了，阳、阴两会馆都由周一人看守。看守工作是清扫环境，维修房屋，早晚到各停柩间点烛上香。有时还要帮丧家给死者装殓，做些较重较脏的活。死者亲属偶尔也拿点小费，作为酬劳。

存放在阴会馆的棺木要缴管理费，经济确有困难的也供给棺木并准许免费寄存。会馆里棺木抬进抬出的事情屡见不鲜。存棺数最多时达到满员。存放的棺木分一号、二号、三号三种：一号棺木高可齐成人胸部，夹层，有内外棺，一般是殷实户所存；二、三号两种棺木质地也很好。棺木内壁涂满松香，死人装殓后用较薄的木片子盖棺，再用生漆封口，使与空气隔绝，尸体不易腐烂，棺木也不易渗水出外。但存柩时间过长的，有的仍会散发臭味，那只好及时处理，就近山上埋葬，立碑纪念。

解放后，宁波会馆存柩停止，只出不进。一九五三年，因修浏阳河路经过此处将会馆拆除，仅遗下阴会馆一间杂屋。一九六三年，此屋划归浏阳河路派出所所有，至今仍在。

（本文根据原宁波会馆工人周佩文之子周庚武、周松武兄弟以及年逾八旬的宁波老人朱英灿等人口述记录整理的，特此注明。）

朱云谷堂

朱学方*

家世情况

过去，我的大家庭——朱云谷堂，不仅是湖南省长沙有名的巨富，而且也是安徽省宁国府南陵县有名的巨富。从清朝咸丰中叶开始到民国初期，正是我家的极盛时期，可说是富甲湘皖，名传大江南北。

我家原有家谱已在长沙文夕大火被焚。据家谱所载，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明太祖第八世孙泯王的第十三世孙朱玉堂。原籍安徽省宁国府南陵县。后因太平天国时期局势混乱，才转经江西，落籍湖南，定居距省会长沙约六十余华里的东乡安沙棠坡。

朱玉堂系我的曾祖父，他有子二人：长子（我的伯祖父）朱雨田，次子（我的祖父）朱岳舲。我的祖父死于伯祖父前数年。他们兄弟两人后来都被清朝封有官职。伯祖父为内阁学士，祖父为通议大夫。伯祖父有四子。祖父有两子。伯祖父的四子中，有两人官职较高。即次子乔生（我的堂伯父）官至制台。传说他曾奉西太后旨谕专管颐和园石舫，侍奉西太后在石舫上游览和赐宴群臣。（这是堂兄朱申之对我说的。朱申之是伯祖父朱雨田的孙）。伯祖父的三子朱菊尊（我的堂叔父）是经魁、副榜出身，做过上海道，曾

* 朱学方系长沙市郊区蔬菜局退休干部。

与清朝大帅端方一道主持南洋练兵。接着做过四川巡抚，钦赐尚方宝剑。后因参与戊戌政变活动被西太后通缉，避隐长沙东乡“隐居山”，直到慈禧死后才出山露面。现隐居山尚传有朱家老屋名称，钦赐他的尚方宝剑，曾一直保存在他东乡的住宅“云湾”。文夕大火后，我们曾去东乡暂居，在“云湾”时由他的长子（我的堂弟）朱祝崖拿出给我们看过。剑长约一米有零。剑柄系一兽首，剑身由兽首口中吐出，宛如长舌。中间有一道血槽，仍极锋利。解放后，该剑已不知下落。伯祖父的长孙（我的堂兄）朱保之曾在京任度支部主事。我的祖父两子中，次子（我的父亲）朱荷生，南魁出身，做过河南省开封府道台，曾参与清帅端方的南洋练兵。我的第三个兄长朱介侯，优贡出身，做过湖北省黄安县正堂，后又做过湖北省荆州府知府。那时，我们家与当时的权贵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张百熙、瞿鸿机、谭锺麟等，先后保持着密切交往并有联姻等关系。因而我们家在当时的政治权势中，确也有一定的地位。

生财之道

我们家过去致富的原因，当时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甚至还有些神乎其神的传说。说什么我们家是祖坟葬得好，葬了“玉带缠腰”的地穴。还有的说我们家有“木马精”护着，周年家里非雇请木匠砍过不停不可。这些都是捕风捉影之谈。我们家先辈的致富途径，完全是从事正当的商业经营。曾经营盐、茶、粮三大宗生活必需物资；兼以伯祖父和祖父两兄弟为人诚笃忠厚，精明能干，坚守信用，对经商具有远见卓识；再加上当时还有些社会关系也是有利因素，故

生意兴隆，发家迅速。

我们家经营的盐、茶、粮三大宗商品，规模宏大。先就盐业来说，当时长沙的盐要从扬州十二圩运来，即所谓“淮盐”，由官方掌管。经营者称为运商，又称淮商。由官家制发盐票。盐票售价很高，非一般商人能够买到手。执掌着盐票的商人，才能购盐运走，课有税率，称为官盐，受到官家保护。据说我们家当日有盐票不少，特别还在湖南南县坞嘴定有专岸，只能由我们家运购销售，这是当时我们家一笔巨大收入。其次是经营茶叶。过去我们家在长沙东乡麻林、高桥、金井等地设有规模可观的茶场，制成绿茶、红茶和砖茶，用硃漆木匣盛装，上盖有“乾益升”牌记，运销全国各地，并在许多大城市设有经理专庄，后又开辟市场运销俄国。那时，交通不便，我家把茶叶从内地用骡马车运到新疆吐鲁蕃，再售交俄商。据说我们家是私营华茶外销的首创户，这是三十年代末期曾任驻新疆茶庄经理杨文藻老先生回忆我家历史情况时说的。又据我现健在的堂兄朱镇衡说，曾有人假冒“乾益升”茶牌名，制成膺品，上面盖着“乾盖井”牌记，企图鱼目混珠，混入市场。后来被承销商发觉，向我们家交涉。我们家为顾全信誉起见，将全部伪造品备价承收。由此可见当日我们的先辈经商的气魄，同时也可想到我们家那时经济力量的雄厚。我们家对粮食经营，也不同于一般粮商。粮食来源并不向外购进转售，完全是来源自己田庄租谷。对佃户除订有常年减租规定外，还要看禾交租，因此，当时许多农民想方设法要租我们家的田耕种。粮食售价，总比市场价格略低。在安徽南陵和湖南长沙都设有囤粮栈房。对粮食价格和数量都能掌握主动权，经得起市场的风

浪。

清帝退位以后，共和国成立，曾一时倡导举办实业。我们家停止茶叶经营，除继续经营盐、粮外，也不遗余力支持兴办实业。当时长沙的华昌炼矿公司（在碧湘街）、华实纺纱公司（在银盆岭）以及和丰火柴公司（在北门外）相继成立，我们家都参加了巨额投资。后又独资在暮云市创办长沙市一家机制的阜湘红砖公司，砖上印有"阜湘"二字，原湘雅医院、雅礼大学、青年会等单位建筑用砖，都是阜湘红砖公司的产品。

我家先辈究竟置有多少产业，就当时情况来说，确也令人闻之咋舌。据说仅就田租计算，安徽南陵县和湖南长沙县、南县、华容等处共约有田租十余万亩。土地数量也多，如长沙小吴门外藕芽冲一带（即今烈士公园后面和省委蓉园等处），南门外金盆岭到新开铺一带，太乙寺乌龟冲一冲，北门外丝茅冲、新河、李家湖、新河凤嘴、新河长庆街整个一条街和市内太平街、西长街、高井街、孚嘉巷、金线街等地的许多房屋和地皮，都属我们家所有。就上述这些产业数量来看，人称我们朱家是巨富也并不足怪的。

住宅、花园

我的伯祖父和祖父，都喜爱亭园风景，特别是我的祖父对古亭园建设设计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不论我们家在乡村、城市或城郊的住宅都有花园。现就其中较大而著名的两处提出述之：

（一）棠坡：我们家的老屋是在长沙东乡安沙棠坡。大小约有百余间。屋后利用一座山丘做花园。从山麓的一面石

级而上达到山巅，又下到另一面山麓接"朱氏宗祠"（我们家的私支祠）。沿途铺以花岗石为石级，盖成走廊，曲折迂回，每隔一二十米，便有亭或阁。亭阁内布置幽雅，外遍植名贵花木，分布自然。其它空坪隙地设有三五条花岗石花凳或花墩，摆置各色盆景，周年香色浓郁。山岭部平坦，用花岗石砌有长形或方形花台，内植有罗汉松，苏铁、山茶、海棠等木本花卉。另外随山丘起伏，栽有灌木花丛，叠石成为假山，假山内有洞室，可以出入。洞内设有石桌、石凳，可供休憩。连假山一端有一带水池，上架拱形石桥，从山下仰望，疑是悬空架设，显得神奇夺目。山麓另一面的"朱氏宗祠"别具一番景色。正中是祭祀神堂，是一座寺庙形建筑，琉璃碧瓦，龙凤飞檐，铁马传声，古色古香。堂外东西两廊，依次排列我们家当时各人的功名牌匾，硃漆金字，大小一致，肃穆庄严。神堂内两边壁上饰有从麓山书院拓下仿制的宋朝朱熹所写的"忠孝廉节"四个五尺见方的大字，这是晓谕子孙作为家训。神堂上方正中是一座大型神龛，雕龙刻凤，金壁辉煌，内安放我家历代祖先主位。堂中央的香案、祭桌、馨座、祝文架等，都是按照过去"文庙"祀孔形式陈设的。神堂对面是个大厅，两侧安置着钟鼓。另外东西两厢还有花厅、寝室等。宗祠外面，正中是照壁，由东西"辕门"进入祠内，分别经"泮池"两边才进入内厅，极显得气派。所以人们把棠坡住宅和宗祠连在一起，看成是一座整体大花园。

（二）丝茅冲花园（昔称"朱家花园"）：位于省会长沙市北门外丝茅冲，为我们家过去城居时郊外别墅。该园规模虽略逊棠坡，但亭园布置紧凑，高雅大方，风景宜人。园内名贵花

木较棠坡尤多。老花工谭少廉四爹对盆景培植，技艺超群，素为当时我市花农赞佩。冬令红梅椿头，最能引人入胜。素馨腊梅对雪开放，冷风送香透人心脾，实为该园冬天盛景。春暖花开，群芳斗艳，置身园中，观赏群花，心旷神怡，极尽享受。民国初年起对外义务开放。因那时尚无公园，故周年游人不断。不幸于抗战期间，南京巩县兵工厂南迁，进驻该园，因火药爆炸，该园尽成瓦砾废墟。

公益事业

我们家先辈喜好公益，热心慈善，做了不少好事。现就其较为突出者纪述如下：

开新河：关于我们家开新河之事，早已传闻很广。《长沙郊区文史》第二辑陈登甲同志供稿《朱家花园与新河》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情。但也有说新河并非我们家所开。这事总还是可以考证的。不过我认为民间传说，不能事出无因，必有事实根据。同时，我的两个堂兄朱孝曾和朱镇衡（即前面所提我堂伯父朱乔生的儿子）现都年逾八十，对开新河也知其事。他们说还修建了新河凤嘴的避风港和连接长庆街的码头，对船只安全停泊和起卸货物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后来将这部分产业作为遗产分给了他们。这即可为我们家过去开新河之佐证。但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私人能这样开河建港，也可称为壮举。

修石板路：从长沙小吴门外分路口起到东乡青山铺一带的“古大路”一直是土路。春冬季雨水多时，泥深路烂，行人和独轮车往来极其困难。我家先辈有见及此，在路中央加面麻石。这些麻石要从数十里外的丁字湾用人工运来，这个

工程在当时来说很不简单。竣工后，每遇天雨，行人称道不止。

设置义渡：在湖蹟渡口（今黑石渡），我们家原设有大型渡船三艘，每艘雇有专人司渡，义务接送行人。这三个司渡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家的老家人，名叫陈菊生。我在湘北第四次会战开始长沙沦陷前夕，我由长沙市回东乡去，还是他渡我过河的。临别时他问我，万一长沙沦陷，这些渡船怎样安排。我嘱咐他，可设法尽量保存，万不得已时可以毁弃，莫为日军抢去，保全性命要紧。后来长沙光复，得悉三艘渡船被日军焚毁，而可怜的老家人却一直不知下落。

赞助慈善事业：我们家对社会慈善事业极乐于赞助。每年春节前后，我们家在城区发放年米，救助那些无法过年的贫民。另在东乡对孤寡老人发放固定粮折一本，每年秋收凭折向指定点领取稻谷六担，至死时才将粮折收回。这是我的伯祖母生前决定一直实行的，我们后人一直遵办未断，直到抗战长沙第三次会战才停止发放。该项粮折共约三百余本。又如对育婴堂、保节堂、孤儿院、残老院等都捐有巨款，树碑勒石，仍有旧迹可寻。

兴办教育：民国初年，响应倡导新学，我们家办了一所小学，名曰“时中”。起初设在长沙市北郊丝茅冲，民国十三年迁东乡棠坡的“医学”，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本屋，将花园一部改为教室，并扩大为完全小学。师资设备略胜于一般小学，且因该校风景宜人，附近数十里以内学校，远足旅行，多至该校，既可游览，又得观摩教学。四十年代初期，我曾任该校校长两年。后兼任该校董事长，直至解放。

一代经师皮锡瑞

皮崇伟*

先曾祖父皮锡瑞，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清乾隆末年由赣迁湘，始占籍湖南长沙府善化县。曾在长沙南乡冯家冲（今市郊雨花亭乡红星村）、北乡史家坡（今市郊综合农场）、东乡盛家湾等地居住。他表示敬仰西汉尚书今文学大师伏生，名所居曰师伏堂，学者因称师伏先生。他精湛经术，故亦称清大师。

曾祖父生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从小聪颖勤勉，好学深思。幼承庭训，六岁始就外傅，八岁即能作诗文。1863年（清同治二年）十四岁应童子试，补善化县学生员。1864年（清同治三年）十五岁肄业城南书院。1865年（清同治四年）十六岁以邑庠生补廪，每月领食廪饩。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二十四岁登同治癸酉科拔贡。其年湖南名秀才同登者十人，湘潭王壬秋（闿运）有赠癸酉拔贡诗纪其事。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三十三岁赴顺天乡试，得中举人。因以后三次应礼部试均未得中，便潜心讲学著书。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他主桂阳龙潭书院讲席，两年后移主江西经训书院讲席，先后达七年。江右故宗宋学，偏重理性，或流于禅释。自他掌教后，以经史词章诏士，不课八股；申明西京微言大义之学，教人以经学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姤真。他因材施

* 皮崇伟系长沙市财政局离休干部

教，孜孜善诱。诸生执经问难，他剖析所疑，娓娓不倦，并且撰经解文集作课文，以示诸生。此时，高才隽秀咸聚，学风为之丕变。因他在此主讲七年之久，培植人才，开通风气，成绩显著，遂遭江西梅花、豫章诸书院山长及官绅嫉视、排挤。至戊戌政变后，党议大起。江西御史徐道焜以诬词弹奏，说曾祖父附和康、梁，斥为乱党，奉诏编管。当时，曾祖父亟表愤慨。

庚子乱后，和议告成。国内均感时局孔亟，民智未开，应以兴学育材为救国急务。清政府下令京师立大学，各省遍立大、中、小学。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夏，曾祖父受聘创办湖南善化小学堂，录取学生六十余人。他欣然登堂讲演，勉励学生勤奋读书，成为有用之才。次年，湖南设高等学堂及师范馆，曾祖父被聘任伦理经史讲席，兼代高等学堂监督。其后，张燮钧（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曾三次电湘，请曾祖父北上讲学，均以事辞未赴。

曾祖父留湘讲学先后达五年，历任高等学堂、师范馆、中路师范、府中学堂（长郡中学前身）讲席和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以及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等职。他学通五经，知识渊博，引证详实，诲人不倦，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崇信，亦为三湘学林所称道。

曾祖父以经学闻名于当时，毕生以著述而自娱。1879年（清光绪五年）读临海金诚斋（鹗）《求古录》，乃慨然有志于经，始治《尚书》。穷一世之精力，积毕生之心血，共著书百余卷，计数十万言，而自成一家。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开始撰《尚书大传笺》，经多次补充修改，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始成书共七卷，更名为《尚书大传疏

证》，翌年秋刊于江西南昌。其自序中云："锡瑞殚精数年，易稿三次。既竭驽钝，粗得端倪。原注列郑，必析异同。辑本据陈，间加厘定。所载名物，亦详引证。冀以扶孔门之微言，具伏学之梗概。"曾祖父治经宗今文说，"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

曾祖父少壮时，笃志为词章，尤喜为骈文，著有《师伏堂骈文》、《师伏堂诗草》；中年主讲南昌经训书院专治经学，尝集所作经解为经训书院自课文。既刊有《尚书大传疏证》，又撰成《古文尚书疏证辨正》、《九经浅说》、《古文尚书冤词评议》、《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今文尚书考证》及《圣证论补评》等书。戊戌政变后，杜门著述，撰有《尚书中候疏证》、《驳五经异议疏证》、《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及《汉碑引经考》等书。晚年留湘讲学期间，除撰有《王制笺》外，又撰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为经学课本。王葵园读后与曾祖父书："老兄经学湛然，任举一义，均有触处洞然之妙。所著《经学通论》，读之至于惭汗无地。"至于《经学历史》，则评曰："周予同详加笺释，流布书林，其书较叶德辉之《经学通诰》、陈汉章之《经学通论》，尤为简而得要。"该两书仍为初学治经者所必读。

曾祖父著作刊印行世者，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等。有师伏堂自刊本，多数由湖南思贤书局刊行，流传不很广；惟《经学历史》曾有上海群益书局铅印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及周予同注释本。《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两书，均已收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学基本丛书》和《万有文库》中。现改为中华书局出版。

曾祖父在讲学著述的同时，更关心国家大事，参与上层政治活动。光绪初叶，四境多虞。他悯乱忧时，倡屯田固边救藩备围诸议。中日甲午战后，清朝老大帝国的腐朽面目暴露无遗。各国对我态度顿变，瓜分亡国之难迫在眉睫。朝野上下均主张变法自强，光绪帝锐意行新政。当时，湖南既设《湘报》馆，又兴时务学堂；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等复创南学会于长沙，曾祖父被聘为学长，主讲学术一科。开讲之日，集官绅士民三百余人，曾祖父阐明学会宗旨后，谓："学非一端所能尽，亦非一说所能赅。先在读书穷理，务其大者、远者。将圣贤义蕴，瞭然于胸中。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亦需讲明切究，方为有体、有用之学。惟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庶不负创立南学会之盛举……"学会开讲计三月，他共讲十二次。其主题有"论学之益"、"论变法"、"讲交涉"、"述时事"、"讲通达时务"等。他力举改制变法，议论侃侃。所言皆贯穿汉宋，融合中西，闻者莫不动容。他宣传的变法救亡思想，批判顽固派的守旧主张，对于增强湖南维新气氛和推动变法运动的前进，起了有益的作用。

但是，顽固派则惊恐不安，害怕维新风气蔓延滋长，他们一齐狂吠起来。王先谦、叶德辉率领顽固派党徒攻击南学会讲学是宣传"邪说"、散布"淫词"，说"倡平等"是"堕纲常"，"伸民权"是"无君上"，并唆使其党徒到南学会哄闹。他们还不罢休，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又逼我曾祖父离开湖南去江西。南学会因而被迫停讲。

戊戌政变发生，西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新法悉被废除。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杨锐等

六人殉难于京师。曾祖父闻此噩耗，放声痛哭，于枕上作《哭谭复生》五言诗五首。末首云："君非求富贵，富贵逼人来。讵意山公启，翻成党祸胎。曾无纨袴习，竟枉栋梁材。沧海横流酷，人间大可哀。"他以此诗表达自己悲恸之情。

由于曾祖父积极参与南学会活动，亦遭到清政府的惩处。曾被革除举人，交地方官管束三年。至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冬，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注销参案，奉诏开复举人，而仍令随时察看。

曾祖父瘁精学术，体力早衰；且为忌者诬奏，以布衣罹党禁，身心倍受打击。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他病卒于善化故宅，终年五十九岁。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安葬于长沙市南郊冯家冲之祖山。

简述父亲吴建三的一生

吴 斡*

父亲建三，号砺贞（1877—1939），世居善化县（今长沙市西郊岳麓山乡观沙岭村）。清光绪癸卯进士。幼年承我祖父通议庭训，治学勤谨，于一九〇二年考取秀才，同年八月考取举人。一九〇三年二月会试取进士，是年八月殿试考取主事。

父亲始官刑部（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主事（司法官），办事谨慎及时，精审每一案件，从不主观臆断。因得上司嘉许，列入荐章，简放河南省候补知府。历时两载，没有实缺，仅做些临时差役。至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那年，我祖父逝世，父亲奔丧返里办理丧葬，遵旧居家守孝，候补知府的官就此失去。

一九一五年冬，郭宗熙（长沙东乡人，前清翰林）被任陕西省渭南道道尹，因郭与父亲系同年进士，知其才德，来函请出任道署秘书长。于是，他东山再起，束装赴陕到任。至一九一六年郭调任吉林省长春道道尹，他仍偕往，继任秘书长职。数年幕僚，纯系依人作嫁，没有什么突出功绩。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国，升任郭宗熙为吉林省省长，父亲始得一麾出守。初任额穆县知事（县长），继调盘石县知事。不久，该省五常县盗风昌炽，郭因父亲在额、盘两县

---

*吴斡系望城县第五中学教师

都有政声，为弭盗风，遂调父亲任五常县知事。

五常县是吉林省最偏僻之地，响马（即强盗）最多，抢劫风盛，地方人民生活极不安宁。父亲见报案者日或有之，遂立志以除盗安民为己任。经多方调查研究，与县衙人员协作，探得盗魁所在，缉拿归案，予以禁锢，拟处死刑。可这盗魁钱多势大，地方人不但不敢侧目，反有人为他求情。父亲探问求情者："你们不但不痛恨强盗、不要求惩办，反而出面求保，究竟是什么原因？"求情的人们说："我们是出于无奈，有口难言。"父亲询问良久，才知盗首的爪牙众多而凶恶，慑于党羽的暗害，不得已才来求保。父亲未加指责，却未接受这个请求。随后，有盗首亲信来许以重金求赎，被父亲严词拒绝。继而又有人挈来盗首的美貌少女，愿送给父亲做丫环（实意是做妾），以求释放。父亲厉声大骂："你们这班狐群狗党，竟敢用金钱美女来诱惑本县！实话告诉你们，罪大恶极的盗首，不杀是不足以平民愤的。"这些人被斥得狼狈而走。

父亲鉴于盗首拥有财势，乃急申报上司（民政厅），以处死请批。得到的批复是"详审"二字。他初不知其中缘故，遵示重又详讯。经核实罪证确凿无误，再次详报上司，请批示处决。批复比上次多了二字，为"继续详审"。至此，父亲判定盗首的亲信已贿及上司，上司企图拖延了事。他气愤不已，怀揣县印，坐上轿子，直指民政厅，亲自面见厅长栾佩石。他理直气壮地说："今日我把县印带来了。五常盗首不除，请派人接任县知事。"栾厅长素知父亲刚直，今以去职力争，也就不敢敷衍了事，遂批准了对盗首的处决。

父亲回衙后，随即将盗首押往当地正法。盗首已处死，党羽随之销声匿迹。五常县的抢风终于扑灭了。

五常平静，郭又调先父任桦甸县知事。桦甸亦属吉林边远地区，盗匪并不亚于五常，但不象五常有为首的强盗集团，能收杀一儆百之功。父亲改计剿抚兼施，经常亲率卫队四处巡逻缉捕。哪怕是天寒地冻，也坚持夜间出巡。次兄元常（解放后，曾任长沙市纺织品公司会计，已病故）当时随父在外，亲见父亲夜巡归来，须眉凌冰垂垂，毫不介意。桦甸匪盗虽多，经父亲率兵勤拿密捕，又采取教育让其悔过自新等宽严结合的手段，且有五常盗魁之戒，因而匪患逐渐平息。他离五常、桦甸两县时，百姓多有感激流泪者。

一九二三年春，父亲应同年举人、江西督理署（即督军署）秘书长陈册襄邀请，任该署秘书。后又在南丰县任知事两年。一九二五年他曾一度还乡，时年近半百，两鬓斑白，已呈老状。后又应友人邀请，先后担任常德厘金局、耒阳上堡粤盐税局、江西省土地局、湖北通山县政府、湖南特税局和公路局等处文牍或秘书，但为时都不长久。一九二七年冬，前省长程潜在湖北省开府，他任过程公的机要秘书。数年间，辗转于湘、鄂、赣三省，供职的单位也不少，到最后告老还乡时，只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

父亲教子很严，常以学问在勤、持身以正为训。我们兄弟三人。长兄京宏（病故），能诗文，甚端谨；次兄元常，善文章，精计算；我系满子，为先父最喜爱，但教育从不稍宽。我五岁时，父亲即教我识字、书法。我八九岁即授以《四书》、《五经》和《唐诗三百首》。如我不长进或有嬉戏，他轻则呵斥，重则鞭笞。我今日能略晓诗文，任教高中

语文，除学校所学之外，父亲所授亦大有裨益。至于他青年时开馆授业，或平时闲处家居，对前来求学问难者，能坚持有问必答，有惑必解，做到诲人不倦。他的学生中品学兼优者，不乏其人。据我所知，就有郑小从、吴肖宗、吴琴潭、吴竹筠等君。乡里从游者，亦大都端谨之士。

父亲体貌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人望之不怒而威。然亲友来访则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回首当日情景，犹历历在目。父亲病故时，我才十二岁，对他生平事迹的了解，自然不够全面。上述这些，仅是父亲家居时教诲所得。

回忆伯父吴建三

吴肖宗

我的高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名的秀才，伯父建三更是天资颖异。他幼年随我祖父读书，过目不忘，援笔成文，日有读书写字课程，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老。他年十二三岁即应秀才考试，可是献赋（应试）十年未就。自一九0一年至一九0三年的两年多时间，他四进科场，由白身到进士、主事，四科（级次）连中，这是应考人中所罕见的。

伯父是清代末期由甲科进士出身的中级官员，二十六岁时即作了京官，后应人邀请供职各府、局。他宦游三十多年归来，却是两袖清风，身无长物。晚年生活，衣食仅给，仍处之泰然。

伯父悉心研究古典文学，古文词、古今体诗都做得很好。他不吸烟，嗜饮酒；性豪爽，喜漫游，京都、金陵、南昌、长安等地都有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多有题咏。如偕友人黄黄山（湘中有名诗人）游南岳，他俩步韩愈题岳寺门楼诗韵，各题诗一首，刻于石上，置岳庙内。伯父诗有“湘水西来吾道东”之句，至今烩炙人口。抗战期间，他游岳阳楼作联云：“吴楚拆东南，今日谁援天下溺；湖湘留砥柱，君山宛在水中央。”寓意祖国秀丽山河不会沉沦，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坚定。他写散文宗法两汉、唐宋八大家，尤以《史记》、韩文为最崇尚。所为文章，颇似韩体。周凤九（解放

后任全国公路局总工程师）任湖南公路局局长时，修建湘黔公路。路经一条叫能滩的小河，水流湍急，要驾铁桥通车。这项工程的规模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竣工时，伯父替他撰写了一篇文章，记叙工程措施、始末情况等，刻在石碑上，安置桥头。此石碑可能至今还在。

伯父书法宗道因碑，多宝塔、黑女志，临摩练习。他日日临池，功夫至深，清秀刚拔，自成风格。不过，深自爱惜。日课的写作居多，应酬的笔墨甚少，以致流传于世者不易见到。至于为乡里祠堂庙宇所书的匾额、对联，因世异时移，也都随物毁损而散失。至今仅存的只有家居日课所写中、小楷诗文几件。他对天文、地理、算术等学术，皆欲穷其原理，验之以事。今尚存有他亲笔绘制并附有说明的天象图本。

清运告终，民国成立。元年（1912年），谭延闿任湖南省都督，推行地方自治，把长沙、善化两县合二为一，分为十八镇乡，地方人推举伯父为本（云母）乡乡董，在谷山寺成立乡公所。他在寺内设立按当时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的两级小学一所；又在附近黄家大屋兴办女子职业学校一所。职校除设语、算（笔算）两科外，还设有珠算、针织、缝纫、刺绣等专科，是为我乡有新学校之始。办学两年，很有成绩。不料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派亲信汤薌铭接任湖南都督，汤一反谭延闿所行政策，取消地方自治，撤销了本乡的高级小学和女子职校。伯父苦心经营的教育事业，被汤无理的仇视与扼杀。汤并不因此罢休，认为伯父与谭（汤的敌对派）是同道人士，以清朝甲科进士出身的旧官员不能为民国地方做事为由，饬令长沙县县长搞突然

袭击，来陷害和缉捕伯父。一日深夜，我家早已入睡，汤派枪兵数人破门而入，满屋搜寻。幸那天伯父因亲友喜庆致贺外出未归，未遭拘捕。过了几天，汤又派枪兵数名来我家拘捕，伯父已事先走避，枪兵们悻悻而去。我家经两次骚扰后，长沙县县长已易人。新县长系伯父旧交，未予过问，一场灾难，始得消除。

伯父在乡办学这段时期，我才五、六岁。他带回一至四册课本，教我识字、阅读，循循诱导，乐不知疲。以后他罢官回乡及老年家居，常谆谆教我文字之源、经史子集之著，以及文章作法等，无不详明指导。有时相对倾谈至夜深，兴致犹浓。他逝世时，我撰了一副挽联寄托哀思。联云：

“与公自幼即相依，方今家国忧深（抗战紧张时期），遂教布被藜羹，难言晚景；有子能文伤远隔（时次子元常在外工作），岂独箕裘望切，还恐铜盘竹屋，莫慰苦心。”

史镒生平事迹

史以凡*

我家自高祖以下都系贫农，世居长沙北郊史家坡。自曾祖父以后迁居伍家岭。祖父名镒，字春霆（1874—1933），自幼好学苦读，常利用在田间看牛时空隙读书。清末科举考中秀才。一八九七年又进入维新派梁启超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学习。一九二一年，赵恒惕在湖南搞省宪，由各县选出省议员，长沙有三人当选，祖父为其中之一。他为人性格爽直，遇到有悖于事理的事情，不管在议会里或其他场合，都能仗义直言，因而有人谑称他"史一冲"。由于当时谭延闿与赵恒惕内讧，祖父即拂袖离去。以后一直从商，经办淮盐运销业务。

祖父出身贫寒，深刻体会穷人痛苦，故乐善好施，一生醉心慈善事业。每年寒冬腊月，邀集社会人士，积资购办棉被、棉衣、大米，印制票证，发给贫困人家取用。一到炎夏酷暑，即制备济众水（即十滴水）、时疫散、疮痔膏药等，向贫苦大众发放。他还资助办理救济院，院内置有备用新棺材，施舍无力办葬事的丧家。特别对市区百善堂、保节堂的孤寡老人和孤儿院的儿童，从不吝惜钱财，经常大量捐赠。

二十年代，长沙沿河堤防失修，每到春夏之交，江洪暴发，沿河一带泛滥成灾，所居贫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祖父席不暇暖，日夜奔忙，救助灾民。当时有的富商巨贾，目睹灾民惨状，无动于衷。劝募时，甚至有的一毛不拔。他气愤地说："这类人一身铜臭，只图个人享乐，真是为富不仁！"

祖父赞襄社会公益事实甚多。如从福寿桥（今幸福桥）起，经伍家岭至沙湖桥这段路程，是北郊进城要道。全程凹凸不平而又狭窄，经常交通阻塞。他为方便群众，独自出资修建。以花岗石铺路面，修竣后人力车可来往通行。群众走过这条平坦宽阔的大道，无不称道。他还对当时长沙面粉公司、第一纺纱厂（今长沙纺织厂前身）、光华电灯公司（湖南电灯公司前身）均有大量资助。他更热心于教育事业，如著名教育家胡子靖先生创办的明德中学，是他带头号召淮商捐款，建赠部分校舍。他并担任文艺中学、孔道中学、大麓中学、艺芳女中等校董事。其他如对慈善事业性质的孤儿院、盲哑学校等单位，最为积极赞助，也是这些单位主事人之一。

我祖母廖淑德老人，出身贫苦菜农家，老俩口恩爱至笃。一九三〇年，祖母因颈部患对口疮难治去世，祖父在治丧会上含泪肃立灵前，频频向前来吊唁的人群答礼。他那苍老和极度悲痛的神情，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九三三年秋，祖父因脑溢血逝世，噩耗传到百善堂、保节堂、孤儿院……稚童、老叟、妪妇等无不悲伤泪下。这时，正值孤儿院开菊花展览会，该院以鲜艳白菊花扎成一座很大的吊唁亭，白色的横幅上，写着"史院董春霆荣归道山"九个大字。各方送来家中的挽联极多，有一副我读后至今不忘，因它真切传神，又确能表现祖父为人品格。那挽词

* 史以凡系湘潭市第三中学退休教师

是当时长沙著名人士曹孟其先生所撰，联为：

“人能言，莫如君肯言；人能做，莫如君肯做。应知刚德缘无欲；

于其生，无同道之欢（注：祖父信奉佛教）；于其死，有丧朋之戚。始信交情不以私。”

罗五太太轶事

彭守拙*

罗五太太本名蒋映兰（1901——1949），浙江人。一九三五年由省垣迁来河西望城坡附近竹马塘，文夕大火前定居尹家坳（属长沙市郊区东方红农场延农管区辖境）。我与她背山而居，平时常去她家作客，对他十分仰慕。其人轶事颇多，今就所见所闻，实录点滴。

从小习武　终老飘零

她幼失父母，无骨肉亲人。少时遍访名师，学练武术。成年后，学会一手好功夫。不幸陷入泥涂，与当地官府罗家作妾。其夫罗某籍长沙，排行第五，故人称罗五太太。她婚后仅生一子，取名宝龙。宝龙方五岁，翁、姑、大妇、丈夫先后去世，她携孤子、眷属并护运四副灵柩来长。不料宝龙八岁竟夭折。子亡家破，孤身凄怆。乃收养翠柳，继宝两女乡居，以尽寂寞余生。来乡后，家财日薄。翠柳成年出嫁。继宝旋又失学，于解放大军南下时投入国民党军事学校南移，从此杳无音信。罗五太太孑然一身，贫病交迫，于一九四九年中夏去世，终年四十八岁。她身后萧条，殡葬皆由原佃户龚仲和、龚兴泉凑资处置。所遗贵重之物仅有九合铜制香炉一座，放在箱子里，不知被谁盗去。

---

* 彭守拙住望城县天顶乡川塘村。

克己济困　广交武林

罗五太太自奉俭约。生活朴素，除酷爱抽烟外，别无不良嗜好。她虽家境每况愈下，然扶贫济困，能尽力而为。邻里贫困者，如余秀英、郭大嫂、李先发、雷菊松、谷丁山、龚纯士等，常受她盐米衣物的周恤；她培植药草制成特效药物，替人治伤，不取分文。经治愈者，有谷贵成、彭友胜、李先发、刘寿枚、陈明久……等，不计其数。她所居竹马塘、尹家坳两处，有口皆碑。

罗五太太为人胸襟豁达，仗义疏财，素以气功神力著称。当时有名国术教师如彭铁良、熊伯庄、蔡拐子（外地人）等，常慕名拜访；还有武术爱好者，如曾祥林、雷长生、张桂泉、彭永贵等，亦常登门求教。有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传闻，她的真功夫，仅传授给竹马塘邓波（女）一人。

惩戒邪恶　正气凛然

人知罗五太太有武功，从她下乡开始。那日，她涉江登岸，有抬轿营生一莽汉跟随，初劝她雇坐，后以污言轻薄。她忍无可忍，用手中伞尖轻轻一下点在莽汉身上，并告诉："我住竹马塘，可来找我。"莽汉顿感全身不适，当晚剧痛不止。次日，果真跌跌撞撞，由他父亲搀扶来到竹马塘，向她叩头谢罪。她立即给药，一服即愈。从此名扬乡里。

她刚来尹家坳时，邻居谷丁山，雷菊松两人靠挑脚抬轿营生，一日抬一军人，只付给议定价钱一半，名曰官价，而发生口角。军人无理，却仗势欺人，提起皮箱，趾高气扬，

想撞过尹家坳上。罗五太太得知，出门顺手拧住军人胳膊，斥道："人家肩膀把你当路走，还想赖钱，太缺德了："说罢，手一紧，军人大声叫痛。他仍不放手，直至如数付完款才罢。事后不久，住在附近龚家祠堂圭峰学校（现永安小学）一批安徽籍难民，其中有少数依仗与当时省主席张治中同乡的权势，骚扰村民，摸鸡打狗，谁也不敢撄其锋。一日，有两高长大汉，正指挥一伙人在邻居（李家茶铺）李春生地里挖红薯，罗五太太连忙上前劝阻。两大汉不听，直冲上来挥拳挽袖，并嗾使众人向她围攻。罗五太太见不可理喻，即将两手左右一挥，一个仰面转天，一个扑倒在地，半晌还爬不起来。余众见势不好，一哄而散。

罗五太太身材魁伟，品貌不凡，近处无赖之徒，早生邪念；又知她是个异乡寡妇，更以为可欺。一日，朱八机匠，（混名酒疯子）在同屋任和福店中喝酒，故意向她戏言挑逗。罗五太太不予理睬，转身回房。朱八机匠佯装酒醉，入房举止轻浮。她气忿不过，顺手提住朱八机匠罐鋬骨往大门外一扔，扔出一丈多远。朱八机匠跌倒地上，混身尘土，臀部多处伤痕，不再以酒作邪了。另有一次，龚焕章无故躺在她床上，她见此人不怀好意，双手挟出扔到门外大路上。这班无赖，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无礼放肆了。

罗五太太武术不凡，名声显赫，却遭人忌妒。一次，驻望城坡附近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中有一彭姓军需，明以一条鲤鱼作赠品，实则暗中加害她。数日后，但见彭军需又主动上门向她谢罪，甘拜下风。此事据世居竹马塘耄耋之年的邓九爹回忆说，彭送鱼又谢罪，确有其事。但传闻罗五太太画一鲤鱼贴墙上，每日在鱼鳞上钉钉一口，却不曾有人见过。

谷山寺产权僧俗之争

吴肖宗

谷山是长沙西郊的名胜，山下的谷山寺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古寺。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云母乡公所进入谷山寺办公，在寺后墙下发现两块石碑，挖出洗刷察看，是清代初期康熙年间地方民众在山下建立佛寺的碑记。当时便把两碑的原文拓印下来，呈报各级政府备案。这两块碑文的拓印纸，我都亲眼见过。那时我才六岁，虽略知事，然不识字，莫明其中内容。直到后来先伯父建三晚年家居，在闲话中偶然谈及。

谷山寺前身

谷山原名鹤形山，因山的形势象只鹤而名。相传明代有个藩王叫谷王的，出家来此山做和尚，后人因呼为谷山。山右最高峰叫谷王峰，当日所建的寺庙早已毁灭不存。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地方秩序比较安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经济情况逐渐繁荣，地方民众便在山下建立佛寺，名叫云母寺。山名云母山，本乡亦由是而命名。当时，康熙皇帝最崇奉佛法（臣民都尊称他为老佛爷），国内名山胜地也都建立佛寺，并把被毁的古寺重新修复。云母佛寺建成后塑造佛像，购置香火田，招僧住持，供奉香灯，看守寺宇。由地方推举管公一人负责经营管理，规定年限，轮流接替。刊立石碑安置寺中，上面记述了建寺始末情况、寺中各项规定、建寺人姓名及捐纳银钱数量。寺宇

不大，香火田也不多，是为后来谷山寺的创始。

彭管公接受贿赂　寺产权全交和尚

经过了一段时间，和尚的势力逐渐扩张，便想侵占寺产据为己有，匪朝伊夕，蓄谋久而且深。那年轮到一个姓彭的人管公，因此人贪鄙无聊，和尚给了他一些银子，便把香火田文契和历届经济收支帐簿等全部交出来了。于是，地方建立的佛寺和购置的香火田，无形中落到了和尚手里，当时地方群众也无人过问。和尚渐次扩建寺宇，添置田产。来寺居住的和尚日益加多，云母寺一天一天地兴旺起来。

曾侯得地帮和尚　邱、杨告状一场空

到了清代同治末年（公元１８７４年），本地有个姓邱的秀才，名石亮，是我外祖父的同族兄弟。他和一个姓杨的监生名益幹的，两位先生曾出面向和尚交涉，要将寺产收归地方所有。和尚哪里肯听，两先生便到长沙县衙门告起状来。本来秀才和监生都可出入公门，县官照例客礼迎送。邱秀才又文学极好，县官更是看重，待遇特殊。邱喜吃甲鱼，县官同有此好，恰值甲鱼上市，县官设酒邀邱同吃。这样一来，和尚气急了，没有其他方法可想，只好拿出银子贿嘱县衙胥吏（即办事员）把本案搁置，不即判决，等待时机。

不久，果然机会到了。曾国藩的夫人欧阳夫人正好病故。曾国藩原是一个笃信风水的人，他对父母和祖父母的坟墓屡次改迁，特别讲究选择葬地。他的儿子纪泽习染遗风，也是极端迷信此道。当日替他母亲遍寻葬地，最后在善化县西乡靳江河附近桐溪寺侧相中了一块。此地是桐溪寺和尚所有。和尚

碰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怎肯放过，便慨然相赠。等到曾纪泽安葬了母亲，又把父亲灵柩迁来合塚(此塚至今尚存)后，和尚便向曾纪泽诉说："长沙西乡谷山云母寺本是我们历代和尚建立的。当地劣绅邱某杨某有意强行侵占，在县衙告了状。县太爷偏听那一方的话，恳求侯爷替愚僧申冤……"曾纪泽听了即嘱县官妥善处理。县官奉到曾侯谕令，当下签差拘邱、杨二人到堂具结了案。杨监生比较乖觉，闻风先遁；邱则自以为是县官所礼遇，有恃无恐，漠然视之，不加理会。县差到了邱家，不敢贸然行事，假说太爷买了甲鱼，请秀才去同饮一杯。邱听了欣然偕往。一到县衙，即被摘掉帽子(秀才、监生帽子上有个白石帽顶，表示尊荣，如受处罚，必先摘帽)，按倒在地，重打几百板屁股，打得皮破血流，勒令出具甘结承认云母寺全部寺产永归和尚所有，不得再妄控定案。于是，地方原有的云母寺全部寺产，更进一步地名正言顺属归和尚所有。和尚取得了正式的所有权以后便大兴土木将寺宇改建，堂哉皇哉，焕然一新。云母寺改名宝宁禅寺，列入法门丛林，居长、善两县八大法门丛林之次。

吴牌甲趁机策动　乡公所驻进寺中

民国元年、本乡奉省都督府命令，筹办地方自治，先伯父被地方民众推举为乡董，掌管部分公务。当时乡学亟待发展，正苦无教学场地。有一个姓吴的牌甲（地方最下层的公务员），家住寺庙附近，经常在寺中往来。一日，发现寺内有两个青年妇女居住。吴牌甲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即向当地一个有权威而又好事的士绅某老报告，某老又与省府某官长交好，互通声气，真个如虎添翼。某老听到吴牌甲所述，勃然大怒，乘轿到寺中责问。和尚答称是城中某庵尼姑女儿，前日来乡避乱（辛亥首义不久，长沙一度混乱）的。某老斥道："附近人家都是你寺的佃户，她们既是来乡避乱，何不送去居住？留在寺中，意欲何为？"和尚一时无言可答。此事正发生在邱、杨二人被屈不久，群众积忿未消。附近居民又以邱、杨二姓占多数。邱姓因受了打屁股的耻辱，对和尚更是仇恨入骨。借着这个有犯清规、无可辩驳的事实，群起而攻，竟至把和尚赶走。于是，云母乡公所的人员进入寺内办公，并在寺内设立初、高两级小学，地方民众取得了胜利。

和尚求和　　地方拒绝

和尚被赶走后，并不死心，不惜重金到处暗中活动，曾不稍停。当日云母乡公所虽把清代康熙年间地方建立佛寺的碑文呈报各级政府备案，但都未回文正式裁定。民国二年（公元1913），谭延闿正在其位，力为作新之谋。先伯父与谭是清代光绪壬寅乡试同年举人，颇有交谊。和尚知悉此情，认为胜利无望，思想消沉，只好出面求和，愿将寺产（三百六十担田租）一半拿出办学，请地方归还寺庙。那时先伯父才三十六岁，血气方刚；地方人士也以为帝制打倒，政权属于人民，往后地方自治是铁统江山，因而对和尚所提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哪知不到半年，政局突变，地方惨遭失败，和尚也搞得焦头烂额，简直是两败俱伤。先伯父后来谈及此事，深悔当日处事鲁莽，若能趁机与和尚和平解决，则以后三十年本乡儿童就读高小，不致发生困难。

都督庇护　和尚得胜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汤薌铭来继任湖南省都督，一切措施尽反谭都督所为。取消地方自治，云母乡公所被撤除，设在寺内的高级小学也停办。和尚乘此时机拿出大批金钱，遍贿省中当局，并向法院起诉。省中各衙门行文到乡，严斥地方自治办理不善，先伯父为乡董首当其冲。汤薌铭饬长沙县捉拿先伯父，两次派抢兵来家缉捕，因先伯父与谭延闿交好关系而幸免。结果，法院将寺产权判决，最后胜利属于和尚。从此，再也没有异动了。

常靖和尚笼络群心

事定之后，湘中一位颇负盛名的常靖大和尚来寺住持。他召集和尚们训话，并设宴邀请地方人士，名曰酬劳，实则联络感情，释怨修好。他在席间说了些感谢地方父老的客气话，最后深切告诫和尚们说："今后，你们要尊敬地方父老，不可怠慢；地方公事，我们寺里要尽力协助，千万不能推诿。你们要知道，为了争得一个谷山寺，花费了好几个谷山寺呢。"常大和尚这话遍传乡里，可见当日和尚投资之多，创巨痛深的了。

我从小在外祖父身边，聆听了许多有关谷山寺的传说，长大后，先伯父又与我谈论过此事。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我在谷山寺教过小学，和尚们对我非常友好，经常闲话些已往的事情。现健在的益宗和尚（住望城坡望岳汽车电器弹簧厂），当日住寺中，与我是很相识的。

编　后

《长沙郊区文史》第三辑出版了。这一辑共刊出史料二十六篇，除一篇是综合几位老人口述的资料外，其余各篇均系当事人或知情者亲自撰写或托人笔录，可以说全辑都属"三亲"史料。供稿的二十五位作者，有二十三位花甲以上的老人，其中几位还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大多是文史资料抢救的对象。我们出版这一辑若较之过去有所改进，有所提高，应该说，这是与市政协第二次文史工作会议正确的指引分不开的。

本辑目录，系根据性质相近或互有关联的史料加以组合编排，分作五个大组，不设专栏。这样作可便于读者阅读，编目也较为灵活。今后，我们将继续采用这种作法。

这一辑，承蒙原中顾委委员、湖南省委书记周里同志题字，原省直机关党委书记、离休老干常杏云同志题词，还有被誉为"长沙通"的黄（曾甫）老惠稿审稿并热情提供史料线索，我们深受鼓舞和教益，谨在此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编　者

封面题字　周　里
封面设计　朱詹其

长　沙　郊　区　文　史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　部　发　行)
责任编辑　李炎坤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刷印厂印刷